

徐旭生先生著

教育罪言

中孚署



徐炳昶 旭生著

教 育 罪 言

北平著者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出版

徐炳昶：教育罪言

定價二角五分



版權所有

著者 徐炳昶 旭生  
編校者 大中 中學  
發行者 著者 書店

發行所 著者 書店

總店：北平宣武門外後河沿西頭路南二十號

支店：河南開封財政廳街路南八十三號

旭生先生以杜牧之罪言例而言教育散載獨

立評論檢讀弗便茲承其寄示原稿輯爲此冊

用備同志深切研討實地放驗冀爲根本救濟

國難之一助嗣有所得當卽續刊 校者識

# 著者書店書目

總發行所：北平宣武門外後河沿西頭路南二十號  
開封支店：開封財政廳街八十三號

陽 廉：林肯傳

六角

鄭若谷：大學教育新論

六角

鄭若谷：大學教育的理想

六角

夏宇衆：霧淨集

二角

紀 眉：英日美對華經濟侵略實況

三角

李宜琛：民法要論總則

八角

張則之：投考高中大學英文試題指南

一元五角

徐侍峯：兒童心理

六角

徐侍峯：青年心理

九角

韓道之：政治地理

一元二角

余蘭園：實用化學

二元四角

孫星垣：化學實驗

一元二角

劉孟真：化學實驗

一元二角

- |                  |      |
|------------------|------|
| 王鈞衡：自然地理         | 八角   |
| 魏春芝：生理衛生         | 四角五分 |
| 劉孟真：初中化學         | 一元   |
| 張仲琳：西洋近世史        | 一元八角 |
| 劉秉哲：初中算術         | 一元   |
| 崔夢禹：初中英文拾級       | 一元八角 |
| 盧子道：神經解剖學        | 四元   |
| 彭基相：法國十八世紀思想史    | 六角五分 |
| 稽文甫：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 | 五角五分 |
| 徐旭生：西遊日記         | 三元   |
| 經利彬：生物學筆記        | 六角   |
| 王華隆：熱河榆關平津全圖     | 三角   |
| 王華隆：東三省鐵路全圖      | 四角   |
| 王怡柯：農村自衛研究       | 一元   |
| 王怡柯：鄉村教師救國論      | 一角   |

- |               |      |
|---------------|------|
| 馮梯霞：華北農村生產研究  | 八角   |
| 李柳溪：農村實際調查經驗談 | 二角五分 |
| 梁式堂：鑿泉淺說      | 一角   |
| 李子堂：鑿井淺說      | 三角   |
| 徐金源：川邊西記      | 四角   |
| 汪震：伐木         | 三角   |
| 祁森煥：社會事業大綱    | 四角   |
| 步起            | 一元八角 |
| 吳蘊瑞：田徑運動      | 八角   |
| 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第一冊 | 八角   |
| 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第二冊 | 八角   |
| 趙質宸：鄉村教育概論    | 一元   |
| 高滔：近代歐洲文藝思潮史綱 | 一元二角 |
| 許心武：房屋合作運動    | 五角   |
| 祝枕江：醫師懺悔錄     | 九角   |



柳翼謀：河南大學講演集

賀凱：中國文學史綱要

黎錦熙：比較文法

宋文炳：本國地理

霍本置：本國地理

王鳳崗：中國教育改革與日本（英文）

北京大學哲學會：哲學論叢

北平體育改進社：體育季刊

簡貫三：袖珍社會科學辭典

張長弓：中國僧伽之詩生活

段凌辰：中國文學概論

五角

一元五角

八角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每期三角

六角五分

六角

一元二角

# 教育罪言(一)

徐炳昶 旭生

看一國的現狀，須要看牠的政治或經濟情形如何，看一國的將來，須要看牠的教育狀況如何，大抵是一件顛撲不破的道理吧。我國現在的政治紊亂，經濟窘急，糟糕到十二萬分，已經成了人人不容否認的真實，可是「否極轉泰」，不過是玄學上模糊不清楚，並且靠不住的觀念。牠的將來如何，實在是一個無人能知的大謎。要着現在教育的實在狀況，却令人不寒而慄！考民國二十年來，教育的情形可分為三期：民國初年，承清末之頹習，教育界中無研究之空氣，學生照例上課，照例畢業，唯唯否否，無所短長，不足語于學術，就想恭維牠，頂多也不過說此時期中風潮較少，學生的普通水平線雖低，而能達到此水平線者尚屬不少而已。是為第一期。自民五蔡子民先生到了北大以後，提倡研究，教育界之視聽為之一變，至民八五四運動以後，而達于最高潮。新文化的呼聲偏于全國。大多數的青年均興高彩烈。以為光明世界即在眼前，大家對於他們也有無限

的希望。雖說此期內的懶惰學生，成績頗有在第一期懶惰學生下者，然大體講起，可以說這個時期是教育界有自信力的時期。是爲第二期。近數年來，雖說教育界的風潮並不比前一期多，教育界的經費情形還比前一期較好，而大家對於教育界的信仰却已完全消失。教育破產之呼聲日有所聞，尤其是在去年國難以後。在這個艱危的時候，大家對於教育界希望頗奢，而教育界自身的弱點，却是窮情盡相地暴露。不惟民衆對於教育界懷極深的不滿意，就是教育界的自身，也何嘗不自慙形穢？當學生大爺們同教職員先生或黨國的大人先生爭權利的時候，也未嘗不能抬出幾個大帽子同他們辯論，可是當他們回到齋舍，羣居放言的時候，他們也一定自己知道他們所說，毫無誠意，一文不值。自信力消失，是爲第三期。感覺到自己的空虛無能，也可能的成爲一種好現象，但是像這樣消極絕望的狀態，如果繼續下去，已足以演成自殺而有餘。教育破產，將來無望，我們中華民族一定要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然則詳細審察教育之是否卽如此糟糕，其糟糕的情形若何，程度若何，糟糕的原因何在，再進一步看用什麼法子可以糾正牠，恐怕是現

在一個頂重要問題了。談到這樣實在的問題，說話不免要有些得罪人的地方，並且有時候不得不將我們自己的罪惡暴露出來，讓大家看。可是國難如此緊急，如果大家還是互相欺蔽，互相蒙混，那就不如乾乾脆脆地承認作亡國奴，還可以少些糾葛羅藤；如果脈管裏面還有若干的血液，還不甘心作仇敵的奴隸，那我們就需要赤裸裸地把我們的罪惡表暴出來，披露出來，使大家全明明白白地曉得，然後可以找挽救的方案。

在談一切以前，有一件淺陋錯誤的意見，却是一件頗普遍的意見，必須完全去掉，才可以看出教育自身的真相，這個意見，就是：通常一談到教育腐敗的時候，總有不少的人說：這是由於教育經費的短少和困難。還有人說：這是由于教職員薪水的輕微。實在教育經費的不確定是教育辦不好的一個原因，却不是一個頂重要的原因。至于教育經費，如專就北平及其他大城來講，並不能算少。教職員的薪水實在過於豐厚了！我們先講教育經費問題：專就北平一城來講，由部發的院校經費，每月三十六萬元，除了北洋工學院的兩萬餘元以外，全屬於北平一城的高等教育經費。一年總計就有四百餘萬。以

外清華大學每年經費，也在百萬以上。然則單單北平的高等教育經費，國家每年即須用去五百餘萬。拿五百多萬的高等教育經費，却不能辦出一個像樣的大學，這豈不是咄咄怪事！我聽說東京帝國大學在不多年以前，每年的經費還只有百餘萬，可是人家所辦大學的成績是什麼樣子！我們北平各大學的成績是什麼樣子！如果「由今之道，勿變今之俗」，學校的經費盡于教職員薪水——實在教職員薪水總額超過預算總額者，在國立各大學中，也不是不常見的事！——學生的精力盡于講堂聽講，那就再添一兩千萬元，我敢斷言，想得到什麼發明與發現。仍是沒有大用處的。國聯教育調查團中有一位 Mr. S. K. 先生係波蘭從前的教育總長。他因為中國的教育改進，同波蘭有很多相仿的地方，所以特別注意。據他的估計，北平的小學教育經費，想全辦義務教育，已足敷用。他指摘我們的小學教室，用半天，閒半天，為什麼不能盡量利用？又指摘我們小學校長的不担任教課為世界各國之所無有，均關緊要，從以上各條所說，已足見我國教育款項的浪費。在我國這樣民窮財困的時候而教育界猶這樣的不經濟，真令人無限痛心。至於說

教職員薪水太低，不曉得他們所據的是什麼標準。當我歐戰前在法國的時候，法國大學教授的薪金，每年不過一萬六千餘佛郎，約合我國幣五六百元。其副教授半之。各副教授亦均著作等身，不過年限未到，尙未得教授的名義而已。拿北平普通的教授來講——除了極少數外——也不過可以當他們的學生，絕不能同他們度長量短也。並且他們以授課及著作爲他們的專門職業，不能同北平在別界據有職業而來教育界「玩票」之講師們所可比。在各大城大約只有一個大學，兼課的問題更無從法生；可是法國的生活程度比中國高。歐戰以後，生活程度大增，自然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就全體講起，北平大多數的教授，學問比法國的副教授差的多，而待遇則比他們優厚。這樣還吵著薪水低微，爲什麼不把自己的學問同人家也稍比較一下子呢！再進一步說，教育爲社會中的一種事業，不能離社會而獨立，尤其是不能離社會經濟而獨立，是一件顛撲不破的道理。歐美各國，雖說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可是他們大學教授的年俸比一個工頭一個優良農人的每年所得不能相差多少。加到一倍或兩倍，也就算頂多了。至于蘇俄，近幾年勞心界得

與勞力界享同等的待遇，已經引為非常幸事的，更不必說。在我們中國，則最優良的工人農人，每年所得，也不過三五百元；一個大學教授的每年所得，則十倍十數倍而未有已！這樣的現象不說是病態不能。我敢斷言：設想有些人也能作工作農，也能在大學裏面教書，全國大學教員薪俸，一律減半或減三分之二那個時候，大家一定還是爭著在大學教書，不願意作工作農！由這以上所說，可見教育經費的不穩定與退休金等類制度之未制定實行，可以為教育腐敗的原因，至于教育經費，現在雖不能說太充裕，却還不能說太短少；教職員薪額已經過優，絕無輕微的毛病。這樣的意見，一定有不少的人來罵我，可是事實如此，我也無法作另外的說法。

現在且將學生的受課情形及成績，學校的管理，功課的編制，學校經費的支配，各種情形，撮要一說。

想問學生成績的優良與否，必須先看他們受課的情形如何，是一件一定不可易的道理。終日上課的學生成績果然還未見得優良，可是終日不上課的學生却一定無從優良起

。我們來看現在學生的上課情形是什麼樣子。遠者不論，姑專就北平說。我有一個朋友，他從前在保定育德中學教過學，今年春天他在平西溫泉遇著他的一個舊學生。他這個學生現在北平一個頂有名的私立大學肄業，是一個東北軍閥的子弟。他同他說：你今年要在某學院畢業了，但是我覺得你在這四年裏面，並沒有上到一個月課呀。他的令高足，想了半晌，回答說：到學校倒不止一個月，瞧瞧朋友呢嗎呢，上課却的確不到一個月。某學院如此，其他私立各大學可知。至于國立各大學，不錯，辦理是比私立各學校較好一點。平心講起，國立大學考取學生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大私弊，所以牠裏面的學生比私立各學校學生的程度整齊的多。牠所較好的不過如此。北平有一句話說：國立學校，只要考進去，隨便住四年，就準可以畢業。這句話雖少有點過分，可是離事實相差並不很遠；我從前初辦師範大學的時候，師範大學學生上課的平均數，總不能到百分之四十。及至我緊辦了幾個月後，上課的平均率也不過到百分之七十。學校雖有曠課三分之一就要休學的規定，可是每年一批一批地畢業升級，並沒聽說有什麼休學的。我在那裏辦了大



半年，說是管理較嚴，其實我們所能辦到者，不過此學期中絕對沒有來的學生讓他們休學而已。這已經成了這幾年裏面的破天荒，已經怨聲載道。師範大學也並不比其他的大學壞。一校如此，他校可知。所以專就北平一地而言，每年公私立大學畢業學生不下數千人，而能把自己所學的功課，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在總數中不能過百分之十。——這個比例，我開頭總還覺太小一點，以後問很多在教育界有經驗的人，他們全說：這個比例，止有過大的，沒有過小的。可是大學畢業生的使命，是否止要把功課弄明白，就算完成了呢？大學是教職員同學生研究高深學術的地方，高深學術增高的重大責任全落在他們的肩膀上面。這幾千畢業生裏面，能認清高深學術是什麼，並且對於她有特別興趣的，不能過百分之二。可是對於高深學術的興趣，是研究學問的一種要而不足的條件。研究學問，不但需要具濃厚的興趣，並需要有特別的能力。在這每年數千的畢業生中間。不惟對於高深學術有興趣，並且具有能力者，不曉得有十個八個沒有。大學教育的成績大約如是。再看他們畢業後的服務情形。這三五個具有興趣又具有能力的人

，爲國家社會的鴻寶，但是學校經費已盡於教職員薪水，圖書儀器異常缺少，雖想繼續研究，而機會大非易得，對於社會無大影響，暫置勿論。如果這百分之十的把功課弄明白的學生能安心地在教育界服務，也總還算差強人意。可是那百分之九十的功課，還沒弄清楚，却也在大學畢業的人，往那裏安插他們呢？他們覺得你們是大學畢業我們也是大學畢業。你們每月能掙到一百或二百元的生活費，我們爲什麼不應該有同樣的收入？並且這百分之九十的先生們，雖然不能說個個活動能力很大，可是活動能力大的也頗不少。至于那百分之十的書呆子們，精力盡于伏案，活動能力大的並不很多，歸結，這百分之九十的人們，一部分大舉地向教育界進攻。他們不得意的時候，興風作浪，使這一班功課還清楚的人不得安心服務，得意的時候，他們自己又毫無辦法。每次教育界的風潮，內容情形大約如是。另外一部分跑到政界裏面，軍界裏面，爲政客軍閥作護符。他們有飯吃，什麼事情全不能作。如果飯碗感覺到有危險，就要興雲作霧，什麼事情全可以作出來。這幾年來各省的什麼獨立運動，分離運動，大部分全是念書人飯碗問題的作

崇，當國難初起，人心憤激尙未降低，精誠團結的口號高唱入雲的時候，我在上海，遇著北大一位老同事，他對我說：「前兩天見著某君——某君的姓名我已經忘記，但一定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在某機關作事的人——我問他怎麼樣好，他回答說：『有什麼好？糟糕極了！』我問他什麼糟，他說：『好好的，又講什麼和的？這和議一講成：廣東的人不全來了麼？飯碗不又要打破了麼？這還不糟！』」當時我們談及這些話，我們全非常地生氣。可是以後仔細一想，說這樣話的先生，不過比他人老實一點，所以把心中的話誠誠實實地說出。至於存同樣心的人，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像這樣的國民，却說他們能同仇禦侮，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麼？陶希聖先生說：中國在歷史上，無其他的階級，止有士大夫階級；士大夫當數目少的時候，也可以敦品勵行，比方說東漢；數目過多的時候，就要互相排擠、互相傾軋，蕩檢踰閑，無所不至，比方說唐宋之末季；中國歷代對於異族的抗爭，全由此階級領導，可是他們作的並不很好（此引綜括陶先生的大意）。我覺得他這些話很有道理。現在大學所能養成者，並不是什麼了不得

的人才，不過是一種士大夫階級。他們不上大學的時候，還可以工，可以農可以商。現在上了大學，不能工，不能農，不能商，却對於士的本質是什麼還不了了，不要說他們能盡什麼責任了。這樣的教育如果長此繼續下去，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現在暫且退一步，設想這百分之十把功課弄清楚的學生能安心地服務，中國的學術是不是就有光明的前途？茲事體大，且聽下回分解。

我上一次已經說明現在的教育不大能養出真正的人才；其所養出的大部分是一班新剝削階級；雖說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用功學生，可是因為他們的推蕩排擠，畢業後無法為社會安心服務。現在姑且讓一步，設想國家能夠想出一種法子，使這一班用功學生可以安心服務，那是不是不久就可以有重要的發明或發現，使我國的科學界可以同先進各國度長量短呢？那仍是不能，並且差的很遠。因為：學校中大部分的工作為求知識，可是知識是件什麼東西？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求？宇宙中間一切的現象不住地在那裏變化；這種變化雖說是不住的，在這變化的現象中間却有一種恆定的關係。吾人對於這些關係

，具一種觀察，得到一種觀念，就叫作常識，再加一種比較與研究，得著一種明了的觀念，就叫作知識或科學。然則知識的泉源是分散在宇宙中間的各處的；應該到宇宙中間的各處，自然界(Nature)的全體裏面去尋找的。幫助尋找的工具裏面，有一種叫作書籍。這書籍的本質是什麼呢？古人說得好：書籍不過是一種路程單子。古人辛辛苦苦到自然界裏面去求知識，把他所經過的路程寫出來，告訴我們：這便是書籍。詳細說一點，書籍不過是或簡陋或詳備的一種遊記。看點遊記，對於旅行的預備，也未始不無小補。可是求知總要自己去旅行。就使能把頂好的遊記從頭背誦到尾，對求知識的自身真是還隔了十萬八千里！現在學校的受課，差不多全是教學生去念教課書；這一班用功的學生也不過是念教課書，把念路程單當作旅行！我看見一個在國內坐第一把交椅的大學裏面肄業的學生，他爲生物系(並不是文法各系)第四年級學生(並不是初進此系)，並且頗用功(不是荒唐學生)，他走到天然博物院，並不能分辨桑與榆！他們這樣學生的精力，已盡於念路程單子。將來指導青年，還不就是這一班先生。指導學生求尋知識，他們

從什麼地方能得著知識！我上面所舉的例子，或者少嫌極端一點，可是在中等學校教授自然科學的先生們，對於他們所住在地方的物產，氣候，土宜等事絕不了了者，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我聽說主張直接教育的衛中先生，在山西時曾爲閻錫山辦一模范學校，他同閻氏約：閻氏對於學生畢業時成績有權過問，至辦理中間時則無權過問。學開的很久了，學生還沒有上課。他老先生終天領著學生們，到山顛水涯去遊山玩景。這個時候，自然有人報告給閻氏，講他的問話；閻氏問他，他便以成約相抵：這樣玩到很長的時候，他的學生開始上課了，拿出來課本一看，那裏面所說的事情，差不多全是他們所已經知道的。真正的教育大約應該走這一類的道路。因爲發明與發現，並不是一件什麼神奇的，了不得的事情。你如果把學生引到知識真正的根源，自然界裏面，告訴他們說：你們看：這一類的現象，是照著這樣的規則變化的，這就是古人所知道的某某現象，某某定律，你們可以自己去看觀察實驗，就可以知道她們並沒有錯誤，某某一類的現象變化，古人也會

研究到，也得到若干的知識，但是那裏面還有若干的困難，他的困難點在什麼地方，還有待於你們的研究。還有某某部分，古人尙沒有注意到，有待於你們和將來人的努力。這樣一來，已經明白的現象，半明白的現象，未明白的現象，均羅列於我們的前邊，我們立時向半明白或未明白的現象去進攻，真可以日有所發現，年有所發明。現在不這樣作，却終天在教課書裏面打圈圈，這種教課書，真正同詩賦，策括，八股，白摺大卷，有同樣作敲門磚的功用，真是了不得的東西，可是距離學問自身，渺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所以我常說句笑話：自然界這本大書放在面前，我們却不肯讀，不能讀，却專去鑽研小書，摹擬小書！舉目一望，盡是些教小書學小書的先生，那怎麼樣能行得了！我說自然界，也是廣義的，並不是要偏重自然科學，却忽略了歷史科學或社會科學。比方說：如果想研究歷史科，不專在故紙堆中尋生活，却注意到地上或地下的各種遺物遺迹，以求得古人的生活狀況，那也是直接研究到他的 Nature。按着社會的實在調查，精密統計，參互之以歷史上的經過，求得社會變化的階段和定律，那也是直接研究到他的 Nature

the。可是這樣的辦法，絕不是我們現在在中學或大學的一般先生所能作，所願作的。我常說出以下的比喻：我們現在要教西山，最好不過的方法是到西山去住些時。那邊住起來，每天出去，頂好是帶著科學的器械，觀察那邊的地質若何，地形若何，水泉若何，……住了一月四十天以後，雖不見得對於西山的情形完全知道，可是同他人談起，總是親身閱歷之談，不同隔靴搔癢；那才是正當的辦法。現在教書的人，比方起來，就是南方的人，不惟沒有到過西山，並且沒有來過北平。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對於西山是什麼樣子，連影子也沒看見過。他們住在南方，搜集到十篇八篇關於西山的記載，聯絡起來，貫串起來，就要同人家談西山。也許有一小部分，聯絡貫串的還沒有大錯誤，可是已經隔靴搔癢，道聽塗說的辦法。大部分雖然聯絡貫串的好像有點道理，可是實在講起，滿不是那一回事！沒有自己作過科學的工作，却去同學生談科學，那豈不是一件大笑話！可是現在大部分教書的人全是這樣辦法！那想我國的學術界有前途，豈不是緣木求魚！所以，即使這一班的用功學生得到安心服務的機會，我國學術的前途，仍是不能有



大起色的。

要而言之，我國現在的教育情形，不是到民間去的，却是從民間出的。換句話說，是現在並沒有把學者研究的所得，拿到民間去，幫助農人工人，改良他們的生活狀況。却是用教育的方式，把農人工人的子弟拔出來，使他們以後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願爲農，不願爲工。又因種種的關係，使他們不能好好的上課，不願好好的上課。就有一小部分很用功的學生，也因教育的不合法，使他們徘徊於學術的門外。這樣的現象，如果趕緊變更，中國的教育前途，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 ○ ○ ○ ○  
我們現在來談各學校功課的編制。

我們如果專就一小部分來觀察中外各大學的現狀，一定感覺到一種很矛盾的情形。

問巴黎大學同北京大學那個大學辦的好？沒有人有疑義的，說這一定是前者。可是如果問巴黎大學理科各系畢業的學生同北京大學理科各系畢業成績很好的學生（北京大學必

取成績很好的爲比者，因爲我們的考試現在總是馬馬虎虎，好的同壞的成績可以差的很遠。比較起來，是那些人學的多，知道的多？那却一定是後者。巴黎大學的理科，組織的很簡單，只分數學，理化，博物三組。每一門功課習畢後，考試及格，即付文憑（Certificate）一張。止要在一組中選習過三門功課，得文憑三張，就算大學畢業。後一組與前兩組不能通融，前兩組可互相通，很可以在此組中選一門，彼組中選兩門。學生聰慧者一年即可畢業，然二年三年者也頗不少。可是我們中國學生住大學一定要有四年之久，學分必須要修到一百三十二個之多，功課必須要修到幾十門！自然，法國得過 Baccalaureate 的學生，外國文程度比中國高中畢業學生好的多，無須在大學中補習。他們所要習的科門的基礎知識也要比我國高中畢業學生較好一點。並且，大學中所教的一門功課，頗爲繁重，也許我國課程表中把她分成兩三門。但是全體說起，仍是我國學生學的東西多的多。我問過不少理科的同事，他們全說當日在外國留學的時候，沒有習過那樣多的科目。可是人家的學生學的那樣少，却並不因此減少將來的發現與發明；我們

的學生，學的知識那樣豐富。可是畢業後的發現已經不多，至發明幾乎無從談起。這裏面所含的道理不可以仔細想一想麼？理科各系功課的排列，雖不見得但大合理，是還相差不是很遠。至於文法各科的功課尤爲離奇。以選科爲名，功課可多至十數百種，英文如莎士比亞，迭更斯·麥考萊等等，中文如李杜王孟高岑等等，均無不可成獨立科門。問其對於所講授之作家有何特別著作？毫無。有何特別研究，也不見得有。在中文中，其所特別講授之作家，或已將其全集，從頭翻閱至尾，至西文中大約並此亦不可得。每年開學時，各系主任的門卽被擠破。無法應付，只好每人送一兩點；有三五學生偶然遺習，卽可或班。以後不論是否有人繼續上課，學校均當敬送薪水。人人不敷謀食，「點心店」的謔喻，喧騰人口。這一類的現象，尤以各校中無正式校長時爲尤甚。一無總攬全局和負責的人，各系均作無限度的廓張。及至預算超過，大家全吵着教育經費缺少，如果這樣情形繼續下去，卽使每校每月再添數萬元，而粥少僧多，也絕沒有法子養蓋稍讀過幾句書的災官！中學情形稍好，而高中裏面，因有選科的規定，如學校經費稍裕，則賢

着有飯大家吃，不賢者有贓大家分，始能少安於位；如果想撙節一部分，爲擴充圖書及儀器的用途，那却比登天還難。習俗如此，卽有賢者，也不過仰屋興嘆罷了！至於學生，也絕少有自行研究的習慣。用功的不過希望終天受課。我還記得當我在巴黎大學上學的時候，開始選課達十餘點。一天同一個同學談及，他笑我選那樣多的功課，萬無法自修。可是我國大學的學生，每星期上課至二十餘點或及三十點者，並沒有人覺得很怪。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使他們少上課多自修，他們却茫茫然無所措手足。我所以嘗說一句笑話：說現在的學生並不像上山不去的人，需要人推一把；却像一步不能走的人，總需要人家背著他上山。要而言之，今日的學校，教員無指導學生自修的習慣，學生無自修的習慣，學校無節儉經費，擴充圖書儀器的習慣。理科各系功課的排列，已染惡道，但還少有邊涯。其他則除了實在的經費狀況，竟至毫無限制——有時候連這些也限制不住他們。這樣的現狀，限制了學生的學業；學生這樣的習慣，又限制了授課的狀況。互相爲因，互相爲果；循環牽掣循環限制。現在想打破這樣現成的狀態，殊非易易。

可是這樣的狀態如不打破，那裏配得上談什麼高深學術呢？

至於學校經費的支配，最大的毛病，就是經費幾被教職員薪水占盡，而設備的經費毫無所出。不少的學校，連預算上根本沒有購買儀器和圖書的經費；有些學校感覺到這樣太不合理，劃出來特別的經費，可是因為學校經費不能按月收到，隨便動用，結果又等於零。在後一種的情形，自然經費不穩定，國家要負一大部分責任，但是如果學校當局能真正負責，也未見得就沒有補救的辦法。民八九以後至十四五年。每年差不多總有七成餘的經費。已經年年如是，如果能在這小範圍裏面籌畫辦法，也未始不能較好一點。徐軾遊先生嘗對我說：「當湯爾和先生長我們學校的時候，對於財政扣的很緊，錙銖比較，我們大家全很討厭他。可是現在想起，湯先生是很有道理的。湯先生交卸的時候，學校存款數萬，湯先生對於學校是有一種發展計畫的。自他走後，不到一兩年，大家把他辛苦積存的款項隨便拉用完，學校此後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從湯先生辦學的成績

來看，可見我上面所說的不誤。自民十七以後，教育經費，稍有增益，教育經費的情形也比從前較好一點，可是教職員獨立作事的精神日漸發展！已成的舊勢力萬不容易有所更動！未成的新勢力方日日有所擴張！不管學校的經費情形如何，止要我開了班次，招來學生，請來教職員，你教育部承認也得承認！不承認也得承認！教育界爲全國大混亂的一個縮影，到這一個時期也完全顯著出來。沒有法子往前辦，以至於把萬不能動用的款項——如學生入學之保證金等——也全行動用。商欠無限的積壓，商人自願血本，遂不得不提高價額；學校想換商家，而積欠無法清還，也沒有權利換，重重搜刮，層層盤剝，而學校愈病！

對於這樣大不合理的事項，如果想有所改正裁併，那就要羣起大闕，說我們學校有特別的歷史，千萬不要挨著！殊不知世界有現實與理想的兩端。漸漸離去現實，近於理想，才有進步之可言。歷史就是現實的自身，牠本身就是不完備的，惡的。無論怎麼樣好的組織制度，如果貪戀著牠，牠一定要漸漸的變成一文不值的空殼子，以至於爲社

會進化的障礙。並且，中國學校這樣的混亂，真是前無古人，中外歷史上那有前例呢？尤有甚者，却可以靦顏無恥，說我們學校有光榮的歷史！我們中國辦學三十年，不惟什麼大發明發現還談不到，以至於什麼稍高等一點的科學書，還沒有能翻譯成中文，羞愧汗顏之不暇，還能談到什麼光榮的歷史！像這樣對於軍閥亦步亦趨的教育界，如果不及早回頭，我中國一定要萬劫不復！可是環顧四方，此作彼效，此倡彼和，這一校少好一點，那一校更利害一點；這一時少鬆一點，那一時更緊一點；浩浩蕩蕩，未知所極；障遏百川之橫流，尙未知何日也！嗚呼！

今天得罪人的話，說的已經不少。暫且打住，留待下次再談。

我前一次本來是想把學生的受課情形及成績，學校的管理，學校經費的支配，功課的編制，各種情形，陸續撮要一說。現在學校經費支配及功課編制的大不合理，學生受課情形及成績的一團糟，已經簡單指明，止贖了學校管理的問題；其實也很可以不必說了。因為學校設立的目的，是叫人研究學問的，並不是要把學生招來，排列整齊，教大

家看著好玩的。真正的目的既達不到，其餘的又何必說！雖然如此，學校的管理，有些直接影響到受課和研究學問，有些對於這些雖無直接的影響，而對於學生心理和行爲却有很深的關係，所以我們也不得不說一說。

管理的事項大約可分三類：（一）查課及考試；（二）徵收費用；（三）普通管理。這些問題在中小學裏面，比較簡單。學生年齡小，容易管理，並且也必須管理，所以各學校的管理方法，雖良否不齊，大約總還可以說有管理。就我們耳目較親的平津來講，除了若干的野鷄中學，專以收學費爲目的，應該實行封閉外，大多數總還說得下去。師大女師大的附中附小，尤爲良好。——這些附屬學校，如有不滿人意之處，却在教課方面，管理方面須要改善之處，並不甚多。至於大學方面，不管公私學校，幾乎可以說是全無管理。隨便上課，隨便考試的習慣我前面已經說過。外國大學的上課是沒有查考的，實在也很可以不必查考。可是我國無論何校，無不有點名簿，點名或由教員擔任，或由註冊課擔任。由教員擔任的，點名後學生仍可陸陸續續的來；等到下堂的時候，大



家圍著教員，補行簽到，甚且很高誼的爲未上課的朋友簽到。由註冊課擔任的，學生更隨時可以到那裏查考改正。可憐的小課員，那裏敢說一聲不允許！像這樣點名的結果，是：教員耽誤工夫，註冊課多養不必要的職員，浪費紙張——大半是從外國買來的——而頂大的壞處，却是獎進學生欺騙不誠實的心理。至於好處，我却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出有那一點。考試制度，雖說前幾年因爲牠太偏重機械記憶，大家對牠作一種嚴重的攻擊，但是他的自身却並不是怎麼樣的要不得。並且牠這一種社會制度，頗關重要。如果找不出來另外一種比牠好的制度來替代牠，絕沒有廢棄牠的理由。尤其是畢業的考試：學校既須要給他們一種憑證，向社會證明他們已經取得充足的學力，而學校自身却沒有一種考核的方法，那豈不是對社會行欺騙麼？我國現在各大學考試的實在情形，也不必詳說。只要看各大學無不有曠課超過三分之一，不得參與考試，即當休學的規定，而學生仍可以隨便不上課，隨便不讀書，並且可以隨便不到堂，却是升級的仍是照樣的升級，畢業的仍是一批一批的畢業，就很可以明白了。徵收費用的自身，實在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理想中的學校，並不徵收費用，這個問題等將來再說。可是現在的各大學，對於這些全有很詳細的規定；單就學生的經濟能力說，無疑義的，我國現在上大學的學生，差不多全是些小資產階級的子弟，沒有拿不出這幾塊錢的道理。現在除了私立大學，恃學費爲生命，非交納不能上學外，大多數國立學校的學生，無論學校催的怎麼樣嚴緊，他們可以大部分的有錢穿西裝，却沒有一小部分人拿錢交學費。這件事情，學校給學生一種極壞的印象。因爲入學時候的費用必須要交，入學以後就可以隨便不遵守學校的軌則，那無異乎告訴他們說：你們未入學以前，學校無論怎麼樣苛刻，你們無奈學校何；你們既入學以後，學校已經無奈你們何了！至於普通的管理，好在有「大學生均已具有自治能力」的一句話作護符，就完全談不到。大多數的教職員，對於學生夙具戒心。以不引起風潮爲目的，以敷衍爲手段。即使眼看學生行動的大不合理，未嘗敢加以糾正。學生未嘗以師長待之，彼等亦未敢以師長自居也。甚且揣摩學生的心理，而謬爲之說以便利之。談諧以取容，曲學以求悅，與學生酒食徵逐以聯歡。青年何知，對於此等大便

私圖的「師長」，雖無敬意，却合憐心。他們的受課作事，無論如何潦草，風潮亦可徼倖不起。學風日漸頹壞，而教育界之綱紀愈不可問矣！因為社會的麻木，無制裁，政府的預瞞，無保障，使這一班寄食于教育界的先生們，不得不仰承學生的意旨以爲容悅，勢誠可悲；而這些先生們，忝居師長的重任，却不惜降身辱志，作學生的篋片以求餬口，品誠足羞！並且，近數年來，政治不就軌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青年鬱悶，充滿革命的情緒，同民十三四年時青年的情緒大約相仿。可是也頗有不同的地方。現在全國人民，對於國民黨，情感惡劣，實不亞于當時人民之對於北洋系。對於共產黨的原則：全表示若干的同情，也有同當時對國民黨相似之處。但是，溫熱的程度，僅可與民九十之間相仿。雖亦知其爲真正政黨，並非洪水猛獸，却尚不敢懷很高的希望，與民十三四五年間對國民黨的情緒大不相同。並且，民國十三四年在北方的革命活動，大多數的教職員與學生幾乎全體的是參加的。現在革命的情緒雖頗濃厚，而今日之教職員與學生自身、其生活情形均仍屬於小資產階級，對於其過去，雖有些人明知其不合理，却也不

能無若干的留戀。所以此次活動，教職員幾於全體不參加，學生參加者亦極少數。即在這些實際參加活動的學生裏面，對於共產理想有真正信仰的，還不能算很多，所以更引起外界的疑慮及不同情。這一班參加實在活動的學生，因為政治的動機，惟恐學校無事。稍遇機會，即張皇幽渺，興風作浪；又有百分之一二十的懶惰學生，利用機會，搗鼓吶喊，而學校事遂愈不易處理。其餘之大多數學生，也知道他們別有用意，不肯出來附和。但因為事情的發展，充滿革命的情緒，所以他們雖因有所疑慮，不肯為共產黨作前鋒，而在他方面，又因有所厭棄，不願為國民黨作後盾。在這大多數學生猶豫觀望，徘徊歧路的時候，共產活動不易成功，學校風潮不易息止。風潮的漲退，遂與政府實在的勢力和決心互為消長。此時有熱心的教育家，想引導他們暫時捨棄實際活動，專心研究學問，也幾乎勢不可能。最近學校幾陷於無治狀態，而學生中仍有打倒教育界法西斯蒂的呼聲，其實在的背景大約如此。我們確信：如果法西斯蒂執政，自然不能任學校這樣的一團亂糟；即使共產黨真正當國，也一定要竭力整頓，不能任學生這樣的任意胡為！

可是在這個時候，學校管理雖然也有相當的重要，却不知道應該從何處說起也！屢！

要之，青年的不誠實爲今日最大的災禍。舉凡學校風潮，以至於大規模的匪患，內戰，全無法同牠比擬。因爲那些全是有邊際的，可以量度的災禍。至於青年的不誠實，乍一看覺得沒有甚麼了不得，而散徧各處，無縫不鑽，爲一切災禍的派出所。如果這樣的心理不能逐漸改良，不惟國民黨的黨治沒有法子成功，就是什麼共產黨，什麼法西斯蒂黨，什麼……黨……黨，即令牠們一日上台，也全不能有法子。無論什麼學問也全談不到。可是，現在的社會環境，學校中的授課，尤其是學校中的管理，全是獎進他們不誠實的好辦法也！屢！

以上數節，我已經把我們教育界大不景氣的現狀，約略說過。看見這篇文章的，不免有人跳得八丈高，大罵：傻子！瘋狂！那些也全不要緊。也許有人說：談的痛快，大快人心。那我就回答說：我說這些話的時候很痛心，並不是要罵人來快意。或許有人看罷，就覺得教育界這樣黑暗，異常悲哀，以至於絕望。那我却很抱歉，並趕緊安慰這些

位先生說：千萬不要絕望，還不至於那步田地。要而言之，我說了這許多不順耳朵的話，不是使人快意，也並不是要使人憂悶。所希望大家的，是大家看罷以後，仔細考慮一番，看我這幾次所說的話，是否是真實的，是否是過分的。如果這些話還不大錯，那就希望大家嚴重的考慮，時時的考慮，想出來一種什麼補救的法子。千萬不要說：我們人微言輕，萬找不出辦法，得過一日且過一日。我們堅決的相信：無論一個社會怎樣的繁榮，如果大家全玩愒度日，存「遑恤我後」的念頭，那個社會一定要頹敗下去；反過來，無論一個社會怎樣的緊迫不安，只要大家能鼓起勇氣，奮勵的向前走，那一定可以找出一種辦法。我今日說話暫止於此，下次再將我們所找出中國教育糟糕的原因，詳細寫出來，請大家的指正吧。

我前幾次已經把我國現在教育界裏面的情形大約說了一說。所舉的例子，雖說差不多全是耳目較近，聞見較切的平津的情形，可是「平津爲我國文化的中心」，其他地方，不能比平津好，殆可斷言。像這樣一團亂糟的教育，前途還能有什麼希望！新舊人

物的代謝，非常迅速。國家各界的主要角色，轉瞬就要爲這一班青年學子所代替。你想從這樣教育訓練出來的不學無術，暗昧無識，虛詐油滑的「人材」，他們登台後，能作出什麼好事情！對於國家能有什麼好影響！我國前途的命運，不就被現在的教育所斷定麼？我前面說：民八五四運動前後爲教育界有自信力的時期，直到近幾年來，才爲教育界自信力消失的時期。難道說，這幾年的工夫，教育界的品質就能這樣的一落千丈麼？——唯唯，否否，不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果我國的教育：受病淺，容易療治，民六七時候的養護，已經差不多元氣恢復，那無論什麼人，也不容易在這幾年之間，就把牠鬧的糟到這步田地。現在的情形，我們在教育界的同人，全要負一部分的責任，可是一定要找出幾個罪魁禍首，那却是不可能的。我國士大夫思想的荒謬，發源于數千年前，蔓延植根於全國人心靈的最深處。想把牠摧陷廓清，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五四前後，教育界的名流，對於牠的病源，雖屬稍有所知，却並未能診斷清楚，也未能作根本改革，救正。不過打了一嗎啡針，一時稍現活氣。思想一部分的解

放，整理國故的方法逐漸精密，遂令牠感覺到自身的活動力，尙未完全消失；社會因之對於牠，也就生出一種無限度的希望。實在牠的病根，不惟說還沒有拔掉，並且可以說簡直沒有拔。講學問的人應該念書，念書人應該特別安富尊榮的觀念，仍爲一般人所認定的天經地義。加以民十六七革命以後，政治至今未就軌道；農村破產，人心皇皇，教育界亦未能獨外；教育破產的呼聲遂因之瀰漫於全國。現在必須要將腐爛的主要原因，一一推定出來，指明出來，然後才能開始商量療治的方案。主要的原因，據我們研尋的結果略如下述：

一，士大夫在我國成一種特別安富尊榮的階級。這件事情，在兩千餘年前，大聖人孔二先生的時候，已經成功。孔二先生在封建時代，教育僅及貴族，不下平民的時候，獨能不顧一切，「有教無類」。不管什麼市僧屠沽，止要他們自己能誠心誠意，拿一塊乾肉作贄見請求教訓；全要一點不厭煩的教誨他們。他這樣精神實在是了不得的。但是因爲他希望人求學的心太盛，說話不甚小心，就生出來很大的毛病。他對於請學稼的樊



遲，就痛罵他「小人哉」；可是對於好利干錄的子張，不過安慰他一頓，說你止要如何如何的作，你自然得到俸祿了。他又說什麼「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好像辛苦生產的農夫活該餓著肚子，而讀幾句書的大老官們，總應該吃的飽飽的，舒服服的過日子。從此以後，貴族階級雖然破壞，而念書的人却成了一種新貴階級。以後經過老社會黨許行陳相陳辛彭更諸人的嚴重攻擊，孟老先生沒有法子，才勉強宣布了「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原則。可是他總覺得「勞力者」應該「食人」，「勞心者」應該「食于人」，「食于人者」就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也不算什麼奢侈。自他們這幾位大聖賢把念書人抬得這樣高以後，念書人應該特別的安富尊榮，不要同泥腿赤脚的農夫同受困苦飢寒，成了不可移易的大原則。小孩自從進了學堂門，充滿了什麼「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啦，什麼「問道誰家子？讀書作高官」啦，心內終日憧憬著的，不過是些吃好的，穿好的，高坐堂皇，打人屁股一類的事情。幸而得志，自然可以大過其作官癮；即使不成，也還可以魚肉鄰里，武霸鄉曲，成他們那一種特別好吃

好喝的游閒階級。科舉變而學校，換湯又何嘗換藥？他們爭著上中學大學，心目中何嘗有什麼高深學術的問題？不過是同從前考舉人考進士一樣，想達到享受比別人高的目的而已。記得蔡子民先生曾對北大法律政治經濟各學系的學生說——你們來這裏要認清楚，是研究高深學術的，並不是要作官的；如果想作官，止要到法政專門學校已經夠了，用不著來到這裏云云。這些話是很對的，但是幾千年根深柢固的病痛，這樣的輕描淡寫，怎麼樣就能拔除掉的？又加之以物質文明的進步，個人生活的需要一天比一天高，而全國人民的生產力，一點也不能幫助他們增加，除了積極的剝削，加緊的壓榨，還能有什麼好辦法！現在這樣教育制度底下的學生，如果不讓他們上中學上大學，他們還可以農，可以工，可以商；他們一上了中學大學，他們便不能農，不能工，不能商百分之九十幾，也不曉得士是怎麼一回事，應該作什麼。他們所知道的，就是已經踏進了這一階級，生活就應該提高。每月至少非得著一百八十塊錢，就不能夠生活。他們也不管一般的社會是怎麼樣的生活，他們的親戚隣居，以至于他們的父母是怎麼樣的生活，他們總是

要「居是官，行是禮」的，舒舒服服的生活。大家全知道軍閥是禍國的，是要不得的，可是因爲要舒舒服服的生活，就是當軍閥的小嘍囉，大家也要爭著幹！大家全嘆息于軍閥的難除，其實有什麼難除？如果所謂知識階級也者，全體不給他們合作，他們一天也幹不下去。○民十四五後的北洋軍閥，止因爲一大部分的知識份子不同他們合作，他們立時倒下，足證軍閥沒有知識份子助桀爲虐，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可是大家雖然全說軍閥禍國，大家却全不肯同他們合作，因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必須要舒舒服服的生活，不依附軍閥就無法達到此目的。因爲有這樣重大的原因，所以只好讓軍閥牽著鼻子走。想舒舒服服的生活，他們的目的與軍閥同。自己毫不能生產，又不能幫助人家生產，想達到目的，惟有剝削民衆，他們的方法亦與軍閥無異。所不同的，就是軍閥模模糊糊的禍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却是心中比較清楚的禍國。他們受社會的特惠，得過比較完備的教育，而忘却責任，專圖享受，其罪殆有大於軍閥者！並且打開窗戶說亮話，今日中國最大的問題，並不是什麼國民黨，共產黨，……黨，誰得最後勝利的問題。作民權運動的

和平派——立憲黨——既沒辦法，激烈派——老同盟會——自然會成功；如果主張民生主義的和平派——國民黨——對於民生最近找不出來辦法，那激烈派——共產黨及其他向左各派——也自然會取而代之。政權從這一派落到那一派手裏，即使變更之際，有所犧牲，也並不是大不了的問題。可是這一班不管全國大多數情形如何，却一定要舒舒服服過日子的先生們，在專制時代他們要做官，在立憲時代仍要做官，在共和時代仍可以做官；在北洋軍閥手下可以做官，在國民政府仍可以做官，就是到共產黨……黨統治之下還是要做他們的官；在中華民國可以做官，在「滿洲國」，日本國……國，也未始不可以做官！止要你給他官做，使他舒舒服服的過日子，他就可以不顧一切俯首戢耳的盡聽你的號令；如其不然，不管你是什麼人，他也要同你鬧的天翻地覆！現在國民黨中的黨官，固然太多，可是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不能每月拿到三百五百一千八百塊錢而發憤投到共產黨旗下的，也實在不少。像這樣的政黨，是否有多大的希望，實在也太成疑問。這一班無處不需要做官的先生們，真足以把我們國家，民族，送入萬劫不復境

地而有餘！却是做官教育，遠承數千年，直至今日，還是頂時髦的教育也！嗚呼！

二，書本教育的留毒。我前邊已經談過：求學問好像要自己旅行，讀書却不過是念遊記。遊記念得無論怎麼樣熟，總不能得到什麼新知識。可是我國數千年來，總是書本教育，偶然跑到自然界裏面作若干觀察的，已經是很少很少，不要說近代的實驗方法了。原因就是我國士大夫求知識的興趣並不很發達。他們所注意到的，不過是切已的現象，這就是說：人事間相互關係。他們把經驗過的人事的變化，全寫在書本子上面。求實用的學問，就是到那裏面去找。這個方法本來有相當的價值。可是書本教育因此就形成了。殊不知道人類爲自然界中間的一小部分，不把我們的周圍環境，與我們有關係的自然界弄清楚，却想方隅自限，把範圍內的現象弄明白，是不可能的。並且宇宙中間，不惟同我們人類接近的自然現象，同我們有關係，就是離我們極遠極遠的自然現象，也常常在我們中間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學問的對象是不應該有範圍的，而我國却永遠是故步自封。歐西的科學家，哲學家，注意到自然界的全體，而自然科學逐漸發展，歷史科

學，社會科學也受牠的幫助，更加明了；我國的學術界，注全力於人類社會間的現象，而歷史科學，社會科學反倒比較落後；也就是這個道理。復次，宇宙中間的實在現象，異常複雜。非用極銳利的眼光，把各種現象，分離開，抽象的把觀念和觀念中間相互的簡單及複雜關係，全整理的清清楚楚，然後再把牠們用到實在上面，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是這樣半抽象，尤其是全抽象的科學，開始研究的時候，總是與實在不完全符合的，沒有用處的。純粹數學，幾何學，論理學，全是這樣。專務致用的不大會抽象思想的中國人，對於這一類的知識，很難有相當的成功。我國在玄狀窺基輸入因明以前，不能有已發展的論學理；在利瑪竇徐光啓輸入幾何以前，不能有真正的幾何學；就是在他們辛辛苦苦，把這些輸進來以後，這些科學經數千百年，還不能有像樣的進步；也就是這個道理。我國的士大夫，一方面興趣不夠發展，不肯到自然界裏面去求知識；一方面思想不夠銳敏；不能在抽象知識境域內作出什麼貢獻；所以數理科學，自然科學，在我國全未發達，大家的精神全集中於歷史及社會的知識。又因抽象科學太無根基，所以即在歷

史及社會知識方面，與抽象科學有密切關係的方法的一部分，也未能儘量研精，因此這些方面的知識，雖儲集的不少，而終未能造成真正的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歷史方面，也是敘述的方面多，比較研究的方面少。這一部分的知識，大約全在書卷裏面；能在書本子裏面常打圈圈，本來差不多也就行了，所以我國數千年來，求學問的惟一方法，就是讀書。科學廢了，改成學校，仍是讀書。八股策論廢了，換成科學，也止是讀書。專讀書的習慣，施之於數理科學，自然科學，不過成一種笑話，如我從前所說，徧讀生物學書，却不能辨桑榆；對於科學自身，永遠是隔靴搔癢，不能有任何發展而已。用到社會科學上面，那可就大不相同了。因為，各科學的性質，其抽象具體的程度，大有差異；牠們的對象，其現象繁簡的程度也大有差異；治牠們的方法精粗的程度也大有差異；其結果確定的程度也大有差異；所帶地方性的多寡也大有差異。比方說：純粹的數學論理學，牠們的對象，現象是極簡單的，方法是抽象的，精密的，所得的結果是確定的，毫無地方性的。你如果在英國學這一類科學，你就可以一點不變的拿到日本去用，非洲

去教。半抽象的物理化學，對象的現象，稍爲複雜，方法精密，結果確定的程度，也就稍差一點。所帶的地方性雖很少，却有一點。因爲將來很可以在中國找出來一種新原質，從前的方法一概用不上。再進到具體的科學，如地質生物諸科，現象愈繁，方法亦愈難精密，確定的程度亦愈減少，所帶的地方性亦愈增加。如果在外國學習農業，跑回中國，不精細研究本地氣候若何，土壤若何，附近的水泉若何，林木若何，人民的經濟狀況若何，而貿貿然想到在外國所學的法子實用於中國，未有不鬧出大笑話者。又況由生物進至於人類的生理，心理，現象的複雜一級一級的增加，方法精密，結果確定的程度，一級一級的減少，所帶的地方性，一級一級的添多。直至最後的，最複雜的，最不確定的社會現象，其所帶的地方色彩，蓋有異常濃厚者。所以我們跑到外國去學社會科學，所真能學到的，不過是些方法。至於其結果，所真能實用於中國的，頂多也不過百分之四五十。並且這一部分可用的同不可用的全混在一起，非先對於中國的社會，作一種詳細的調查，精密的統計，確實的研究，絕沒有法子把牠們分離開。進一步說，不



惟結論而已，就是方法，所能用的，不過百分之八九十，並不是全體。因爲，很可以有一部分的现象，外國有，中國却沒有，那治牠的方法，在中國就全有用；反過來，另外一部分，中國有，外國却沒有，那就不能不創造一套新方法去應付牠。所以在外國學數學論理學的先生們，跑回中國，立時拏他所學的教，還可以說得下去；至於學社會科學的先生們，回到中國，不作調查，不作研究，就想把牠所學的原封不動，照樣教授或實用於中國，那簡直是一場大笑話！可是我們中國的人，跑到日本，學到一些對於社會的知識，就趕緊跑回來，告訴國人說：社會科學是這樣的；社會是應該照這樣改革的。以至於跑到美國法國俄國以及其他各國的人，學到一些，無不趕緊跑回來，告訴國人說：社會科學是這樣的；社會是應該照這樣改革的。他們有時候因爲爭奪飯碗的關係，就驢唇不對馬嘴的亂吵吵。吵的利害，如果有機會，還要鼓動軍閥，不惜草菅人命的互相殺戮！所以中國這二十多年的內亂，雖說原因複雜，而這一班學社會科學的先生們，實在要負不小一部分的責任。近來關心於教育的人，如陳果夫諸先生，痛心於文法各科學

生的冒濫，急想有所整頓，意思是很對的。但是他們所擬的辦法，或想將文法各科停止招生數年，或想將公立大學中文法各科停辦，止讓國立大學辦，我却是不贊成的。因為他們諸位先生沒有找出來文法各科真正受病的癥結，並且他所提的辦法，是校節的，沒有很大的補益。可是我雖然反對他們那縮減的辦法，我却是要發憤說一句話：如果現在不把任何大學——國立，公立，私立——中的法學院，一律完全停辦，另起爐竈再來，那社會科學在中國可以說毫無希望！因為幾乎全體的教授，把社會科學的性質鬧錯，他們就不知道社會科學應該怎麼研究，怎麼樣會希望他們能指導學生！——中國現在至多可以辦幾個法政專門學校，訓練幾個實用人材，作法官律師文官等等。另外把全國人材集中，不曉得夠辦一兩個研究社會科學的學院不夠。——可是在社會科學方面，鬧這樣大的笑話——簡直是一齣悲劇——仍是止知道讀書的流毒也！噫！

有上面所說兩個重要的原因，教育的受病已經夠嚴重了。可是這些病的來源已經綿延數千年，我們的先民應該負責任的。然則，難道說我們就不負什麼大責任麼？否否！

絕對不然！如果沒有現在環境上和教育界身上的各種原因，那病雖嚴重，還不至於危急到這步田地。想知道這些原因是什麼，大家仔細想想，並沒有什麼難找出。至於我們對於這些原因的意見，且等我下次慢慢說來。

上一次我談及教育腐敗而應該由古人負責的兩個重要原因，那情形已經很夠嚴重了。由於書本的流毒，好像把人關在不見天日的繡房裏面，他雖不見得立時病倒，可是面孔蒼白無血，身體疲軟無力，一點發育滋長的氣象也不能有。由於好舒服的流毒，就像毒菌充滿血液，麻痺了全身的抵抗力。止等候外面些微的感冒，就可以引起體內的纏毒狂熱。在這個時候，如果有洞明脈理的良醫，將養保護，注之以血清以遏其病菌之蔓延，漸漸使之習熟于風日以增加其抵抗力，亦未始不可恢復其身體的建康。如果毫無覺察，漫不小心，更狂嫖亂賭以助其毒菌之烈燄，則病體委頓，臭惡四溢，將有使人不能不掩鼻而過者。不幸現在的德育頗似後喻。我們再將德育腐敗的應該由現代人負責的幾個重要原因，分析如下：

三，環境奇劣。環境一詞包羅宏富，凡非在教育界自身，應由教職員及學生直接負責的事項均屬此類。約略論起，可分三方面：（一）家庭方面（二）社會方面；（三）政府方面。

先論家庭方面：我國舊日家庭制度，對求學問，不甚適宜。在從前科舉時代，還可勉強對付；到這一種與社會經濟情形完全不合的學校制度成立，兩方面精神的抵觸，才完全顯露出來。我們在外國，看見不少初在大學畢業的青年單身一人，自身謀得最小限度的生活費，以其餘暇在圖書館或實驗室中研究。將來學術界的偉人，有不少是這樣成功的。可是在我們中國，這條路就幾乎行不通。大學畢業後，每月至少非有一百八十塊錢就不能夥生活，想拏這樣多的錢，就不得不拚命去教書，向前研究的工夫全被佔完。這是因為我國的青年特別的貪婪或懶惰麼？少有一點，却不盡然，當他們求學的時候，家中已經供給得筋疲力盡；離畢業還遠，家中早在那裏希望著了。這在道德方面，也萬不能不顧及。即使家中還有飯吃，不立刻希望拏回錢去，而弟弟妹妹的學費父母已經無力

再行擔負，不得不卸到老大哥的身上。並且中國人自來有早婚的習慣，本來大學已經畢業了，標梅之期已經少過了，當然應該趕緊結婚！再說，這幾年的青年，因為社會的大不景氣，眼前沒有什麼理想的光明來引誘了，除了物質的享受，還能有什麼安慰？剛出了學校門，父母，弟弟妹妹，愛人，子女，仰望著一個人的就有一大羣，正好拚命的拉套，拚命的拏錢，那還談得上高深的研究？加以內亂循環，農村破產；自稱的大學，把畢業生無限度的制造，生產過剩，每年失業的畢業學生，以數千百計，益使青年心忪紳駭，慙恍而無所主。大家常怪各大學在校學生，對於熱心辦學，無暇顧及學生畢業出路的教職員不知愛護而常想找出幾個無聊的政客作校長，覺得這些真是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其實，他們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間，其舉動固然笨拙可笑。而其情亦堪憫矣。上面所說的各種原因，除了婚姻一事內中一部分的責任應由他們自己負，其餘一切等等，也不能怪他們的自身，也不能怪他們的父母家人，幾千年沿襲來的家庭制度，也未見得完全錯誤。這樣的責任，除了歸之于與社會情狀完全不相合的學校制度而誰歸！

再談社會方面：這方面一言以蔽之曰：麻木而已，無制裁而已。我國人本來偏重消極，不積極作惡的人頗多，而孳孳爲善的人亦少，『各人自掃門前雪』，社會的制裁力已經很有限。又加之以思想方面的大變化，大混亂；既有中國舊思潮和外來思潮的衝突，而外來思潮中又分兩個極有勢力却絕不相容的思潮，社會本身的蛻變，思想的大衝擊，全聚在個時候。中國四千年的歷史裏，很難找出一個時期可同現代相比者。社會理想（Ibearsocialaux）建樹不起來，還說到什麼制裁力？復次，大學中應該有生活的練習，人人應該對於政治有相當清楚的觀念，所以大學中不能禁止學生入黨。但是，學校爲研究學問的地方，並不是作政治活動的地方，所以不能獎勵他們，利用他們作政治活動。可是我國自民八以後，學生牽入了政治的旋渦。民十四五以後，更進而作實際的工作。對於革命雖稍有補益，而學業日滋荒疏。事畢歸校，隨班聽講已感困難，而生計迫之，社會迫之，不得不要求畢業。依原則言，國家如認學生爲有勞，按績給獎可也；至學校的文憑，則爲證明真學問的充分，並非酬勳的東西，何能隨便亂給？可是時勢所迫

，有不能不遷就者。並且這一班的先生，雖說學問沒有得到，他們在社會上的活動能力——並不是服務能力——却是不小。所以他們畢業以後，頗能得到重要的位置。盲目的社會，震眩于其暫的時成功，而忘却其本身的空疏。歸結，大部分的學生以為不必工作，不必讀書。止要會亂出風頭，混過四年，出了學校門以後，就可以不怕失業。在這樣空氣裏面，想同他們談什麼高深學術的研究，豈不是空中栽花！加以近三四年來，農村破產的情形，日漸尖銳。學生在校的時候，對於畢業後的生計問題有不能不焦慮者。可是他們鎮日所聞見的，不過是：甲不學無術，却得優美的位置；乙貪婪偷錢，已成不受制裁的富豪；丙荒淫無度，却屬黨國的要人；……這樣耳濡目染，就是有道德高尚積極負責的教職員為他們的師表，已經不容易範後生小子的身心。納于軌物，而況今日的教職員，既不能同化社會，却差不多全由惡濁社會同化者乎。

至於政府方面，對於教育，一言以蔽之，曰漠視。如果專就迹象上看，十七年以後，教育經費，大體全頗有增加；積欠比從前總算較少。並且國府主席當軍旅稍有一點暇

豫的時候，就自己兼任教育部長，藉圖整頓，可謂重視之至，斥為漠視，寧非厚誣。雖然，專就教育經費言，數量大小，關係尚屬第二位，一頂重要的，却在其款項的穩定。教育管理，不在于法令嚴密，雷厲風行，而在于不輕改革，鎮之以定，持之以恆。近數年來，政府對於教育，毫無確定計畫，並且可以說，牠對於教育界裏面的情形，有莫名其妙地方。實在教育經費並不需要怎麼樣特別的増加，止要遵守先總理的遺訓。對於庚款，不要任便挈用。對於各種學潮，止要不築室道謀，稍持定力，也不需要什麼軍隊的後盾，就可以完全平息。如果這樣辦理數年，雖說教育制度與社會經濟情形元全不合，終非妥善的辦法，而想辦到教員學生規矩地上課，像清華大學那樣的情形還很困難。清華那樣貴族的教育，雖非我們所嚮求，而學生總還可以學點東西，不至如前面所說把功課弄清楚的學生止達百分之十的比例。可是政府為便私圖，將庚款隨便動用，專就現在經費的數目而論，牠所少發的實在有限，可是教育界因此而受的損失，已經難以數計。至於將介石先生當日之目兼教育總長，適見他對於教育情形的隔膜，我揣想他



的意思，必定說，教育的不良爲社會秩序不安甯的主要動因，比方說，學生思想左傾，動好搗亂之類，所以毅然決然，自兼部長，力圖整頓。他的魄力固然可佩服可是他的看法却完全錯誤了。教育不良能影響到社會秩序，固然不錯，但這種影響，必須經頗久的時間，才可以看出來，對於這一點，直到現在，教育界自身還沒有很清楚的觀念，蔣先生軍務倥傯，我想他是不會看到這些的。至於學生思想左傾，動多搗亂，那全是社會秩序紛亂的結果。止要社會稍有秩序；以中國人之好靜惡動，左傾搗亂雖不敢說要完全絕迹，絕不能成大患害，殆可斷言。倒果爲因，必至止湯揚沸，究有何益？辛而蔣先生尙頗持重，未取嚴厲整頓，否則卽封閉若干大學，槍斃若干教職員學生，亦不過治絲而益紛之耳。數年之間，教育毫無全盤計畫；今天說大學區制好，就試行大學區制；明天有人反對，就把他停辦。實在，不管一種制度怎麼樣好，開始實行的時候，萬不會沒阻力；不真正實行三年五年以後，也難看出他利弊之所在；試行一年半載就恢復原狀，即使舊制全非，新制全是，而終不如不改。前日何所見而行大學區制？後日何所見而廢大

學區制？袞袞諸公，以及教育當局，均毫無成見也。一事之起，政府漫無成見，多詢之於教育界元老蔡李吳戴諸先生，這本是一種賢明的辦法、可是這些位元老意見也不一致，並且有時候，一位的意見也不見得很堅定；這樣而想教育能有全盤的計畫，豈不甚難？並且我所尤不能明白的，却是吳稚暉老先生的態度。吳先生的道德人格為我們所敬佩的一個人，他的識見也很多超絕羣倫的地方。但是他們對於教育界中每一次風潮，總是持仍舊貫主義；你要問他的理由，他好像要說：這些洋八股學校，反正是辦不好，不如隨牠去，他看準現在的學校所教的是洋八股，我現在異常佩服他觀察力的銳利，因為我對於這一點，直到近一兩年，才深切的感覺到——雖然說他老生意中的非洋八股的範圍，同我們意中的非洋八股的範圍，大約還不很相同，可是現在各中學大學裏面所教的東西，差不多全體並不是真正的科學，不過是一種洋八股，那却是毫無疑問。他老先生觀察力既是這模的銳利，而又身負教育重望，我想他一定要嘔盡心血，想出些補救的法子。但是一直到現在，却還完全沒有看見，並且好像也沒有去作，那豈不是一件令人難

以索解的事情麼？如果說他怕得罪人或怕麻煩，那又不像他老先生的素行。然則在這些地方現也只好疑以傳疑，不敢冒稱解人了。

政府的情形既如彼，教育界元老的意見紛歧並不堅定又如此，並且處到現在複雜萬分的環境裏面，想要教育的發展，真是「憂憂乎其難」。此外如政府內容的不景氣，用人的毫無方針，均足使青年的身心受一種惡劣的影響，因為大家所詳知，不再贅論。

四，教職員的太不負責任。現在教育的惡濁腐敗，雖說古人同現在教育界以外的人們，均不能不負點責任，而最重要一部分的責任，却不能不卸在教職員的肩頭上，那也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其他的一切，對於學生的影響，還不過是間接的，至于教職員的學問品行，却是時時刻刻直接影響到學生的身心上面。可是他們負的責任雖然如此重大，而所以養成這樣腐敗的真正原因，分析起來，却又頗為簡單。第一，他們不肯切實研究學問；第二，他們對於學生不能負指導訓練的責任。這樣的譴責他們，他們不免要推委說，現在學校設備不完善，生活無保障，怎麼樣能責備人來負責任研究和作事呢？他們

這些話當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但是如果把各國的思想史，科學史詳細翻閱起來，一定可以看出來當那些大思想家大科學家作出他們的大發明，大發現的時候，他們所服務的機關設備未見得就怎麼樣的完善，他們的生活未見得就會絕對安定，昨天我聽傅孟真先生說：曾經得過納伯爾獎金的物理學大家布萊克（Dirac）先生，他的研究室在一個很卑的房子裏面，即使晴天而光線亦不充足；外邊又爲公衆打靶的地方，終天煩囂。他這樣的實驗室，無論北平任何大學中的實驗室也要比他的高明。但是他竟在那樣的地作出他很重要的發明。北平各大學的設備自然說不到很好，但是像樣能用的也還算有一些；十七年以後，教職員的薪水欠的還不算很多，可是求田問舍的教職員雖說頗有一些，而肯對於他們所教的學科作一種切實研究的人已經是鳳毛麟角，不要說什麼發明與發現了。他們自身就沒有研究的興趣，怎麼樣能指導學生去研究呢？至於學校的無紀律，教職員所負的責任也極重大，我相信：如果一個學校裏面的教職員，全富于研究的興趣，對於學生的訓練肯負全責，那個學校裏面就不能有風潮，即使偶有風潮，也一定很快地

平息。可是現在的學潮，大部分總有些教職員作背景。真正的原因由于理想不同，意見不同的頗少，差不多全體是由于飯碗的衝突。像這樣學問，這樣品行的教職員，怎麼能談到指導和訓練學生！即使他們能辦的巧妙，安靜無事，也不過誤人子弟更有效率而已、與教育家，思想家，科學家的責任，固絲毫無關係也。

五，學生思想的懶惰。學生對於功課方面的懶惰，大部分應該由教職員負責。但是他們——尤其是大學的學生已達成人的年齡，具相當的知職，對於來到他們前面的一切事情，就應該用自己的理性審擇一番，得了相當明了的認識，然後負責的去應付牠們；這才是應該取的態度。可是現在的大學學生，對於一切，大至于國家政治的組織，近至於母校重要的變革，大多數全認為與己無干，漠不關心。學生的團體，除了極少數人所組織的或能照軌則進行外，全體的組織，如學生自治會等類的團體，差不多沒有一校不是由少數人把持的。你要怪他們的把持麼？那却不能這樣簡單的斷定。因為最大多數的學生全覺得這會裏面的事情，對於他們毫無利益而抽手不問，管事的止有很少的幾個

人。那會的前途止有三條：第一，如果碰巧這些管事的人是很熱心的人，那結果就是這些人累得要死，事情也辦不出來什麼大成績，並且常常受那些說涼話的人的悶氣；第二，如果這些當選的人是些平常不熱心的，那會務就要完全停頓；第三，如果這些當選的人是些好便私圖的，那他們却很可以利用他們那些小小的職務，得著種種生發，除了第二種情形不必談外，在第三種情形之下，固然是把持，但是在第一種情形之下，又何嘗不是把持？你又怎麼能怪他們把持呢？並且，好便私圖的人，何時蔑有？何地蔑有？不過異邦大多數的民衆看的很清楚，不肯放棄自己的責任，就有少數好便私圖的人，也看得出，如果亂七八糟的作，與他們自己毫無所利，所以不能去作，不敢去作。至於我國，就是大多數的大學生，也不清楚社會是應該怎麼樣組織，自己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而竟一味旁觀。你要問他們爲什麼不肯問事，他如果是很誠實的，一定告訴你說，這些事情對於他沒有什麼益處。然則他們的無理事，同好便私圖的人是一樣的，也是自私自利的。所不同的，就是他們的自私自利是消極的，至於好便私圖的人却是積極的。天下

事總是積極者戰勝消極者，然則在中國，好便私圖的人，很容易達到目的，又有什麼可奇怪呢？所以中國事，括總說起，少數的作惡爲患猶小，大多數的昏惰爲患甚大。大學生因爲自己所處的學校大，就很自命不凡，然而他們的昏惰，並不亞於他界，這真是有志之士所極感棘手的事。他們大多數沒有問事的習慣，並且可以說沒有用理性去思想的習慣，所以偶爾問事，他們思想的淺薄極可憐憫。我現在隨便舉一個例子：國難以來，各報的讀者論壇。我倒常常翻閱。這些文字大約爲各大學的學生所寫。主戰之聲囂然於耳，但是怎麼樣戰，戰的近果若何，遠果若何，大體變化若何，這些問題，却不常有人想到。我個人自從國難以來，是前後一致的堅決主戰派，但是，我們相信，即使全國動員，堅決抵抗，而一定要敗，敗的結果，沿海大城，除却廣東的，一定要被敵人占領，北方的大平原也早晚要被敵人占領；這些結果，現在主戰的青年，恐怕未見得全想到吧。沿海大城失後，餉源無著，繼續抵抗，我們相信是可能的，但是很艱苦的；這些鉅大的困難，恐怕今日主戰的青年差不多全沒有大想到吧。北方大平原失後，想要繼續抵抗

，一定需要地方的民衆團體結起來，連絡起來。同敵人作連續不斷的游擊戰，然後才能找出最後的出路；這也是一件萬不可易的事情。但是作游擊戰，在山間易，在平地難。我們應該想出來什麼樣的新辦法，才能戰勝這種困難？在平原作游擊戰，需要馬匹甚多，而我國馬政不修，馬匹不敷用，戰勝這種困難，雖說不見得無法，而方法却是必須我們嘔盡心血來想。像這一類的問題，多至不可勝數，我疑惑今日主戰的青年，恐怕全沒有想到吧。即使持久以後，戰可以勝，而傷必異常的鉅，痛必異常的深，全國優良的青年恐怕要有一多半的傷亡，這樣的結果，恐怕今日主戰的青年未見得有人想到吧。這一切重要的問題完全沒有想到，而冒然主戰，自欺欺人，又何怪山海關炮聲一響，大多數的平津大學生趕緊向後轉，回家走呢？我們辦教育十餘年，止養出些思想如此昏惰的學生，真是令人痛哭也！

要而言之，現在教育腐敗的責任，古人要負百分之三十上下；環境，或可以說教育界以外的人們要負百分之二三十；教職員要負百分之三十以上；學生自身也不能不負百



分之十上下的責任。而在教職員中，負責任尤重者，爲所稱之教育專家。

六、教育專家的尸位素餐。我這樣的譴責教育專家，大家不要疑惑我又來附和孟眞先生，同在美國學過教育的諸位先生們爲難，也不要疑惑留法學生想希圖留美學生的飯碗，實在我個人雖然沒有學過教育，更不配稱什麼教育專家，但是我在大學教書十餘年。辦理教育行政也有五六年，我毫沒有意思逃脫我個人應負的責任。實在情形，却是我國興學四十餘年，而教育上很基本的一件事情，並不難看出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把牠弄清楚。教育是一種社會事業，萬不能離社會經濟而獨立，實在是天經地義，萬不容磨滅的一件真理。中國的社會經濟情形同歐美各強國及日本有極大的差異，是無論何人全可以看得到的。可是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是抄襲日本，就是抄襲英美法德各國的。他們這些國家全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剝削的壓榨的國家，我國却是同他們相反，是被剝削的，被壓榨的國家。人家是大富豪，我們是窮光蛋。一個家徒四壁的貧人，想教育子弟，却抄襲人家大富豪的辦法，無論說學不像，就使能亦步亦趨，究竟能有什麼用

處？我現在深相信梁漱溟先生的話，我們所抄襲的教育制度，止可名爲都市教育制度，可是我國全體是無限農村所集合的，非另外創造一種農村教育制度，我國的教育前途無希望的。——我沒有讀梁先生書以前，這個意思我也已經有了，不過都市教育，農村教育兩詞，却是沿用梁先生的。對於這樣一個基本問題，我的聞見很鄙陋，好想很多的教育專家，並未曾嚴重考慮過似的。止有舒新城先生前年曾到我家，談到這個問題，有深切的認識。舒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我直道現在還沒有拜讀過。對這個問題認識頂清楚，知道現行制度根本要不得的，據我所見，大約止有梁漱溟先生。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他對於鄉村教育所提出具體的方案。在外國學教育的人，好比在外國得到一套新式建築，就想原封把牠搬到中國來住。他在這個時候，至少應該有兩步萬不可少的工作，第一，是現下的地面是否可以放得穩，如果放不甚穩，必須要有些平基補牆一類的工作；第二，是應該看看這樣的建築與中國的氣候相合否，與衛生有益否，如果不相合，必須用理性斟酌新舊，創造出來一種與中國的氣候相合的新建築。第一種工作在那

建築裏面。或者就可以作。至于第二種工作，那却非跳到建築外面，精密考察研究，沒有辦法。我國的教育專家，好像囚在他們那一套的建築裏面，永遠沒有能跳出外面，看看與環境適合不適合的機會。他們所能作的，至多是第一步工作。至于第二步。雖不敢說他們永遠沒有想到，但是意識是會混的，好像除了這一套或其他相類的一套，萬不能有什麼新的一套，所以他們也沒有感覺到跳到外面看看的必要與可能。我個人不敢冒充教育專家，但是總願意也跳到外面看一看。至于所想出的新辦法對不對那却希望大家破除成見，精細的來討論。

現在教育腐敗的原因，據我所分析到的，大約如上所述。並且我們相信，現在教育界及教育界以外的人們，固然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可是制度自身也有極大的缺陷。不設法改革，而想挽救已經頹壞的學風是不可能的。至于我們所擬的改革的方案，且聽下回分解。

我上一次曾經說過：我們相信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與我國的社會情形完全不適合；

由無限農村組成的中國，應該創造出來一種農村的教育；至於從前所用的都市教育應行廢棄。所以我們對於教育是根本改革派。但是在我陳述我們的改革計畫以前，先要陳述我們相信當擬改革計畫的時候所應該遵守的幾個根本原則。

一，擬計畫以前對於各國的及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應該完全知道，但是當擬計畫的時候，應該把這一切完全忘掉，專就我國的社會情形，社會經濟情形想出一種教育他們的方法。將計畫擬好以後，對於現實的與理想的教育有不銜接的地方，當然不免要找出來些過渡的救濟方法，但是這些救濟方法，應該是改革計畫完成以後再添加的，不應該從計畫未成以前就混進去的。這也是很平凡的原則，用不著怎麼樣說明。不過我還要聲明一件事：就是我們雖然相信：擬計畫以前，對於各國的及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應該完全知道，可是我個人對於這些，實在知道的很少，所以我所擬的改革計畫，一定有很多不適宜的，不精密的地方。這些却全希望肯承認我們農村教育觀點的教育專家來幫助我們、糾正我們，擬成一種確可實施的中國教育制度。

二、這種新教育制度實行以後，人民是應該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的。我們終天談民治，教育制度應該注意到平民均等受教育的機會，這也是如日月經天，萬不容磨滅的一件真理。可是我國現行制度，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由我們北幾省談起，有二百畝地的農家，不過能占全體農人百分之四五的比例，或者還要更少一點。他們已經很算富農了但是他們如果想供一個大學學生畢業，一定要鬧的筋疲力盡！至於其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對於高等教育，絕不敢有所希望！我從前說，作官教育，可以陷我們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而有餘，可是一個大學生當他畢業以後，他家裏已經供給得筋疲力盡，他就不想作官，不想每月拏幾百塊錢，風俗上怎麼樣能允許他？道義上也怎麼樣能允許他？想這樣拏，而自已又沒有一點生產的能力，社會怎麼樣能夠養這樣多的寄生蟲？所以上面所說這一點如果做不到，不惟民治永遠做不到，教育的自身也永久沒有清明的希望。可是這一點能達到不能，却全在我們所說的第三件根本原則能作到不能。

三、新教育方法一定是與生產相聯合的，尤其是要與農業相聯合。我國從前半耕半

讀的理想是很好的，可惜沒有辦到。不過在從前行科舉制度的時代，離這個理想還不很遠；學校制度成立以後，士農分業，似乎萬沒有再合的餘地了。大家也疑惑半耕半讀，乃中世紀不進步的辦法；時至近世，必須清楚的分業，才能專精勵志，學術界才能有迅速進步的希望。大家因為有這樣含混的觀念，所以對於都市教育的系統，雖也間或有人看到牠同社會經濟的情形不適合，而對於牠總不敢有根本上的懷疑。其實半耕半讀未能作道，並不是因為農人沒有工夫不能去研究學問，却是因為歐美工商業的社會，把教育都弄到都市集中，集中的結果是一切設備比較精良，進步比較容易；我們想趕上他們，遂不禁盲目地跟著他們跑。殊不知：集中是一件事，集中于都市是另外一件事。我們現在散漫看夢想從前科舉時代的或可以半耕半讀，固然要關到圖書儀器不完不備，工具荒陋，進步毫無的危險，可是集中在大都會，那却是初改革的時候，沒有看見將來的流弊、懶惰著不肯改良鄉野的交通，因陋就簡的辦法。說集中以後，離家鄉遠，即學校設在鄉野，也不容易兼從事農業，那自然也有點道理。但是因離鄉遠而不得不含棄農業，

那是因爲沒有組織。如果感覺到必要，盡力組織，沒有找不出辦法的道理。並且士農分業，即在學業上，也有很大的毛病：農人終天同自然界接觸，而因爲無知識，無方法，不能把他們所得的日常經驗，精細的記錄下來，比較起來。求學問的人，却老在書本裏面打轉轉，不同自然界真正接觸，學問不能真正的進步。並且因爲他們的身體與自然界隔離日遠，耐勞苦的能力逐漸消耗。今日的士大夫，身體衰萎，不能任艱苦的工作，同農業隔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能把學校移在鄉野。另外的組織起來，與農夫的生活打成一片，則農夫能整理其經驗，已經踏進了科學的門坎，求學問人兼事農業，日與知識的泉源接觸，學問自然親切；身體也可得到健康，不致有神經衰弱等類的毛病，真是一舉而諸善備了如果有人疑惑農業工商業全關重要，何以我們專注重于農業？那我們就答他說：中國是以農立國的，我們相信不惟今日如是，即將來亦仍如是。我們固然希望全國的農業工業化以增加其生產力，也希望我們的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不再受帝國主義的壓榨，可是我們不希望將來工商業畸形發展，再步他們的覆轍。我們相信，

改革教育而注重與農業相聯合在最近的和較遠的將來，全不至于大有流弊的。

四，新教育制度的養成人才，要矯正從前供求不適合的弊害，須按著社會需要的數目而訓練，這個原則如果在國富充裕的時候，或者不很需要，可是在今日民窮財盡的時候，却是絕對必要。再進一步說，如果國富盈溢，即今日的教育制度，也或者可以不急著改革。前清鹽商鴉片商有錢以後，拿出來錢養些清客，還能間或對於文化有所補益，何以見得現行的教育制度，大經整理，就不能養出幾個人才呢？不過在現在的時候，學校裏面多養出一個廢物，另外一方面，就要添出好幾個餓殍。現行的教育制度，無論怎麼樣整頓，總有很鉅大的不經濟，所以萬不能不從事改革。

我們所擬的新方案，略如下述：

現行的教育制度可以說是分爲幼稚園，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學，研究院七級的。我們覺得這樣瑣碎的分法實在是不必要。在我們的新方案裏面，止有三級：兒童二歲（以下所言均依滿歲計）至六歲受幼稚教育；六歲至十五歲受國民教育；十五歲以



上爲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一方面爲專門教育，另外一方面爲大學教育。

一，幼稚教育。我們計畫中的幼稚教育的機關，雖然也叫作幼稚園，而離現制的幼稚園頗遠，離理想中的兒童公育辦法較近。兒童在兩歲以前，正在吃奶，應由母親招呼。兩歲斷奶以後即入幼稚園。每村可在村邊空地闢四五畝爲幼稚園。中心約畝餘，爲兒童的遊戲場。周圍建築些樸素堅固的土房爲兒童的住室。每所可容兒童十餘人，保姆二人。一切睡覺，吃飯，穿衣，沐浴等事，均由保姆經理。此周圍兒童住室以外可多樹林木，大小無定，亦爲村人遊息之所。兒童除風雨或大寒暑外，工作遊戲應均在遊戲場或小林中。外加一避風雨室，不得已時入之。房質應與村中通用者相同，惟注重于清潔及堅固。兒童的衣物食料均當由各家按月均攤送往。縣城附近可開一保姆訓練所，由每村送數婦女往受訓練。畢業後即在本村服務。薪金較其他經營農家副業者稍優。

二，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中頂關重要的是教職員如何養成，所以當談牠以先，不得不先談高等教育裏面的師範學校。

因爲在我們的計畫裏面，沒有中學小學的分別，所以我們擬議的師範學校，也沒有高等初級的分別，爲一專門學校。牠的位置是在鄉野的。但因爲交通的方便，可選擇離鐵路百幾十里，有馬路可行汽車自行車，並適宜農業的地方。學校的房屋，止要不潮濕，不黑暗，堅固，清潔卽好。無論校款如何充裕，不準建築清華燕京各大學一類的房屋，以致把學生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無論何種學校均應如此，不止師範學校也。師範學校附近有兩個大規模的農場。第一農場爲就我國舊法稍加改良者。第二農場爲新式工業化者。這兩個農場爲全校教職員及學生的共同耕作場，不得雇用工人。無論何種學校中均無年暑假，農忙卽作田工，農閒卽講學問。如初辦不易得能農事的教員，也只好暫請在農科畢業者經營農場。但以能手自耕種者爲限，不能者絕不聘請。師範學校的學生前半入第一農場，習我國固有農事；後幾年入第二農場，習新法農事。學生由各縣選派。在新制度中，萬不準河南省人跑到山東省服務，也萬不準南陽一帶人跑到彰德一帶服務。止有鄰縣不出百里者教職員始可互相通融。每縣應先作一精密的統計，預計需要某種

教員的數量若干。比方說，需要生物教員二十五名，那就要陸續選派三十五名就學。因為恐怕有中途輟學及疾病死亡等類情形，所以必須多派十名就學。學生一切全屬官費。在我們新計畫裏面，高等教育一切學生，幾乎全屬官費，一定有人疑惑款項何來，那就需要分別來說：我們的學校是一個大農場的組織，教員學生自耕自食，本屬不成問題。我想經營的好，一定不止夠教職員及教職員的家庭以及學生工人的伙食。如有贏餘，即當儲蓄起以為廣充學校設備之用。住可由國家負擔。學校在鄉野建築，地址容易寬暢，不成問題。建築樸實堅固，供學生寄宿，辦法同現在的學校可大致相似。至于行，我們理想中學生，如果有一百二百里地，一定可以步行走去。不過我們希望師生多作有計畫，有組織的學術旅行。這一類旅行。路途較遠，應呈請教育部核準後，即由國家免費。然則食住行均不成問題，衣則應視學校的性質，分由政府或地方負擔。各省應斟酌地方的氣候，定每學生需棉衣若干，衾衣若干，單衣若干；皮衣需要與否，由省政府酌定。著為定式，頒行各縣。材料不惟不準用舶來品，即他省土產亦不準用。本縣有土布即

用本縣土布做成，否則用鄰縣的土布做。每月可斟酌情形，給每學生零用費五角。法國戰前，凡服義務兵役者每人每日得銅子一枚爲零用費，此定五角，已軾優厚。如此則每學生每年費用大約不出三四十元。畢業後必須在本鄉服務。應視地方經濟情形，酌給薪金。如一優良農夫經營農家副業，每年可得百元者國民學校薪金可從百二十元起。漸加至百五十元止。如此則學校經費一定大減，從前六年義務教育猶患經費不足，現在九年仍不患無辦法。

國民學校略如現在的小學，但有兩點大異：一，先生學生盡屬農夫。農忙力田，農閒治學。二，授課不如現在的每點鐘變換而以時季畫分。自然科學授以春夏；數理科學授以秋冬；歷史社會及藝術各科分配于各季。自然科學十分之八的時間係由教員領導學生作附近百數十里的旅行，隨地引誘學生啓問，繼之以講授；只有十分之二的時間到課堂中以學生的實際見聞，與書籍相印證。英國的植物。法國的礦產，學生將來一點不知道，也尙無關宏旨。可是他們那近數百里面的動植礦物，氣候，土壤等類，一定需要他

們全弄得清清楚楚。秋冬則學生全到校受課。衣食原料可由兒童父母送往學校。學校請人烹煮縫紉；但任此役者並非工人，亦係教師。兒童至十四五歲時，即教之以烹煮縫紉，使他們自己試作。不過教烹煮縫紉的先生，不必由師範學校出身。十二歲，加授農家附業及作本地相宜之簡易工藝的知識。

三、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分專門教育及大學教育兩種一切專門學校均與師範學校相類。不過商科各種學校地址，可近通都大邑，工科各種學校地址，可近工業區域以便實習。附設農場亦如師範學校。將來全國人士，可以有人因職務關係——如法官醫生之類——不能兼事農業，但須無人不能從事農業，亦以防學或中輟。失業堪虞也。工商業的學校，須斟酌情形；如前二三年不須實習者，仍當附設第一種農場，資其練習。以後本業實習增加，農業實習減去。如開始即有本業實習，亦可將農業實習酌量刪去。如法律等類學生應由國家考選者，衣服零用費由國家供給。各種專門學校學生均受嚴厲軍事訓練一年。將來除有陸軍專門學校教授高等軍事知識外，沒有另外的軍官學校。非專門學

校畢業者不得爲軍官。此等軍官非有外患，亦不得動員。各專門學校無齊一的年限，自三四年至十年不等。海陸空軍等類的專門學校，大約均須十年。三年後免除農業實習；後，三年得有少量薪水。專門學校畢業生服務薪金額數均採「錄足代耕」意，按年漸進，但均不得超過優良之農夫工人所得一倍。凡一切實用科學均在專門學校講授，至理論科學則在大學內研究。專門學校生的受課要比現在大學學生少的多，自修及實地練習的功課多的多。但仍有若干的受課，與大學不同。

大學教育前有預備學校。預備學校中止教授數學，國文，外國文各種工具學問。雖亦有附設農場，練習農事，而無年限，自由上課；國家亦不供給衣服零用費。大學中以研究室爲單位。全大學中或有二三課堂。大學中無學生，只有助手。助手由受過預備教育的學生中考取。入後即有少額薪金。研究主任如認爲需要者，每週也可亦給他們講授一半點鐘。餘時均受研究主任的指導，學習研究。他們除了將來可以代替主任，繼續研究外。絕沒有另外出路。如果有特別研究，能在科學中自找出一新枝，得將計畫呈學校

最高之審查會審查。合格後即由學校酌加一研究室，並任之爲新研究室主任。待遇則一切同研究主任——因爲大學中並無教授——可得到優良農夫工人全年所得的一倍半。專門學校畢業生服務五年後。得入大學研究室中受指導研究。研至三兩年得有特殊成績後，可歸入專門學校作教授，其待遇與大學之研究主任等。如某地方教育經費特別充裕者，可特選已經服務五年而成績優良的國民學校教員，入大學，研究本地方所特別需要的科門。如果成績良好，研究主任認爲有繼續研究的能力者，得由地方或大學爲之設置一新研究室。待遇亦得比大學中研究主任。如過四年未得允許者，仍歸國民學校服務。

我們所擬新教育的輪廓大約如此。看見這個計畫的，是否有人感覺到牠同蘇俄的制度有很多的相同點，疑惑我多從蘇俄的制度取材？那我就老實告訴他說：對於現行教育與社會經濟狀況的不適合，我於民國八九年初回國的時候已經感覺到。但是那時候國難未急，我個人的精神頗覺麻木。偶然想到，不過想設法子補救他，對於都市教育的自身，未能有根本懷疑。前年上半年曾在北大講演過一次教育制度的問題，也仍是這樣的思

想。國難驟來，我麻木的精神頓受鉅大的刺戟，對於現在的教育狀況異常痛心。深思之餘，漸知教育制度自身的缺陷，中國抄襲外國教育制度的荒謬。但直至去年暑假時，消極方面雖已清楚看準，而積極建設方面仍未能有所擬議。暑假後閉戶冥想。始得結果，大約如上述。同時讀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一步，對於教育部分，驚為先得我心。對於他所用的都市教育，鄉村教育二詞，亦認為確切不易。但是這個時候，我對於蘇俄的教育，很慚愧的，什麼全不知道。所僅知道的，不過是他們完全不抄襲歐西固有的教育制度，而另外獨出己裁，以求適於他們那社會的新環境而已。我既然想出新計畫，就間或同朋友談起。有一個朋友問我對於蘇俄的新教育制度是否頗有研究，我答完全不曉得。他說你說的同蘇俄的制度相仿處頗多。這我才非常高興，向他借到一本蘇俄新教育。讀完之後，才知道我對於新計畫中所懷疑的各點：教育縮成三階段，國民教育的延長，大學研究院的合併，均與蘇俄制度暗合，或大同小異。閉門造車，出門還能合轍，狂喜可知也。至於同蘇俄制度不同的各點，那却不是我所懷疑的。另外蘇俄的教



育方法，有極多很好而我却沒有想到的地方，我當然希望實用的時候，把這些儘量採擇進去。不過我現在却沒有把牠攙在我上面所說的計畫裏面。這上面所說的計畫，大體可以說完全是我自己想的。我現在所希望的，就是全國關心教育的人們，把教育的現狀，極嚴重的思想；對於我們的新計畫，極嚴正的批評。如果覺到這個改革方案不好，就提出另外的方案；如果覺得牠還有可用的地方，就精詳的補正。有一年的嚴重討論，這個問題或能鬧出一點眉目，然後得着一個實驗的區域，從師範學校辦起以爲改組國民教育的預備。三五年後，全國試用新教育制度，我國教育的前途，或者能有轉機五！

——對於卍生先生教育方案的商榷——

吳景超

卍生先生在獨立評論發表的教育罪言，前後共有六篇。五篇是批評的，指出現有教育制度的缺點；最後一篇才是建設的，提出他的改革教育的方案。我在這篇文章裏所要與卍生先生討論的，只是他的方案。

我覺得卍生先生的方案，其最新穎的一點，便是注重農業教育。六歲以下所受的幼

稚教育，我們姑且不談。他的國民教育，與現在的小學不同的，便是「先生學生，盡屬農夫。農忙力出，農閒治學。」國民學校中的教職員，雖然是師範學校出身的，但是這些師範學校，「位置是在鄉野的，……師範學校附近有兩個大規模的農場，第一農場爲就我國舊法稍加改良者，第二農場爲新式工業化者。……師範學校學生，前半入第一農場，習我國固有農事；後幾年入第二農場，習新法農事。」換句話說，從這些師範學校出身的，只能教授農業，對於別種職業是外行的。旭生先生在高等教育中，還是一貫的注種農業，所以商科各種學校，工科各種學校，都要「附設農場。亦如師範學校。……工商業的學校，如前二三年不須實習者，仍當附設第一農場，資其練習。」「大學教育前有預備學校，預備學校……亦有附設農場，練習農事，而無年限。」

旭生先生爲什麼要使全國的教育農業化呢？因爲他覺得這種教育，才合於中國的需要。他對於中國社會的組織，以及變遷的趨勢，有下列一句重要的論斷。他說：

「中國是以農立國的，我們相信不惟今日如是，卽將來亦仍如是。」

因爲他有這樣一個前提，所以才有的全國教育農業化的方案。這是他的主張中最新穎的一點，也是我認爲最可商榷的一點。

主張以農立國的人，近來真是不可勝數，但是什麼算是以農立國，可惜沒有人給他下一個詳細的解釋。假如說中國以農立國，只是要表明中國的多數人，是依靠農業爲生的，那誠然是一件事實，但我却認爲是一件可憐的事實。因爲這一件事實，只是證明中國的農業生產方法落後，要多數人在農業中勞碌，才維持全國人的衣食。生產方法進步的國家，只要有少數人在農業中努力，全國衣食的資料，便有着落，如美國在一九三〇年，只有百分之二二的人在農業中謀生，不但生產可以維持本國人的衣食，還有餘剩可以運往外國，便是一個好例。中國在農業中謀生的人數，現在雖無統計，但許多估計，都把他放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文化先進的國家，生活程度高的國家，沒有一國的農民。其百分數是在七十以上的。根據一九三二年的國際年鑑，農民百分數在七十以上的國家，可攷的有南非洲聯邦的黑人，（七五・〇）印度，（七二・三）布加利亞，（八二・四

(一)立陶宛，(七九·四)波蘭，(七五·九)羅馬利亞，(七九·五)及俄國。(八六·七)俄國的統計，是一九二六年的，那時五年計劃還未開始。現在我們敢說俄國農民的百分數，要降低很多了。以上這些國家，如把俄國除外。試問有那一個國家，不是比較貧窮的，生活低下的，文化落後的？所以如說中國以農立國，便是多數人依農爲生的好意思，那麼我們最好努力改良農業的技術，使少數人耕之，多數人便可食之。如此便可使很多的人，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從事于別種實業，努力于他種生產，使中國的財富，除農業外，還有別種來源。

旭生先生又以爲不但現在的中國，是以農立國，即將來亦仍如是。這便等于說是，中國的經濟組織，是固定的，是不變的。但是旭生先生於什麼根據，下這種奇異的推測？在旭生先生所提倡的新式師範教育中，不是要學生習新式農事麼，不是設備一種新式工業化的農場麼？我相信中國的農業，如不開倒車，總有一天會採納新的生產方法，如旭生先生所希望的。假如有那一天，中國農民的百分數，一定要減少的，這可以外國的

經濟爲證。我們試看各國的歷史，凡是農業進步的國家，沒有一國農民的百分數，不是下降的。今列表如下：

國名	第一時期	農民百分數	第二時期	農民百分數
美國	一八八〇	四四·一	一九三〇	二二
比利時	一八四六	四四·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一
英國與威爾士	一八八一	一二·〇	一九二一	六·八
德國	一八八二	四二·五	一九二五	三〇·五
瑞典	一八七〇	五一·六	一九二〇	四〇·七
瑞士	一九〇〇	三一·二	一九二〇	二五·五
挪威	一九一〇	三九·五	一九二〇	三六·八
法國	一九〇六	四二·七	一九二六	三八·三
丹麥	一九〇一	四六·二	一九二一	三四·八

荷蘭	一九〇九	二八·四	一九二〇	二三·六
粵國	一八七〇	六八·六	一九二〇	三一·九
匈牙利	一八九〇	七〇·五	一九二〇	五八·二
加拿大	一九一一	三九·二	一九二一	三二·八
澳大利亞	一八七一	四八·〇	一九二一	二二·九
新西蘭	一八八一	二九·〇	一九二一	二七·一

以上這些國家，第二時期的農民，百分數都比第一時期為低。這些國家裏面的農民，有的只是百分數的降低，如表中所示的。有的不但是百分數的降低，而且是實際數目的降低，如美國在一九一〇年，在農業中謀生的人，有一千二百六十五萬，一九三〇年，只有一千〇七十五萬。德國在一九〇七年，農業中有九百八十八萬人，一九二五年，只有九百七十六萬人。丹麥在一九一一年農民有五十一萬人，一九二一年，只有四十七萬人。法國在一九〇六年，農民有八百八十五萬人，一九二六年，只有八百十九萬人。

但是這些國家的農民，雖然減少，而農產品却在增加。以少數的農民，產多量的農品，這是最經濟的生產方法。假如中國採用這種最經濟的生產方法，當然無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在農村中。所以假如中國的農業有進步，中國人依賴農業為生的人，是要減少的。

以上這些討論，只是要說明我與旭生先生對於中國情形的觀察不同之點。我們的見解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認中國的國民，大多數以農為生，但他以為這是一件好事，所以要把教育制度去遷就他。而我却認為這是一件可憐的事，能早日脫離最佳。脫離這種畸形的狀態，使中國除農業之外，還要發展工業，商業，交通業，運輸業，金融業，礦業，乃是我們所希望的。此外，旭生先生認將來的中國，還是以農立國，而我以為農業技術進步的結果，農村中可以不必要容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這些剩餘的人，將來一定是在別種職業中找生活。結果，中國人口的職業分配，一定要與現在不同。那便是說，將來大多數的人，不一定要靠農業為生。我們即使學不到美國，學不到澳大利亞，也應當學到法國。英國當然不足學，因為他誠如旭生先生所說，工商業畸形發展了，弄

得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在農業中。不過我們要記得，工商業的畸形發展，固不足取，然而農業的畸形發展，如中國與印度，又何足爲法。

我對於旭生先生的前提，既然不能完全同意，所以對於他的教育方案，也不能完全贊同。他提倡農業教育的精神，我是很表同情的，但是他要使全國的教育農業化，就未免「矯枉過止」。我們先不談將來中國的情形如何，就拿現在的情形來說，中國人口的分佈，并不完全在農村中。中國人的職業，也不完全是耕田種地。中國在百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據我所知的，至少便有三個。滿十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據託格雪夫（Boeris P. Torgsheff）在中國評論週報三卷十四期中所說，至少有一百十二個，此外在五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我們還不知道有多少。陶內先生在中國的農工一書中，估計中國的市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請問這些人的子弟，也都應當習農業嗎？假如他們都習農業，那麼中國的商業，工業，運輸業等等，應當交誰執行？總之，「驅天下之民，歸之于農，」乃是中國以前的頑固思想，由于不明他種職業的生產價值而發生的。自



從經濟學發達以後，誰都知道一國的經濟組織，不是靠一種實業所能維持的，一定要各種實業平衡的發展，才可以收國富民榮之效。所以我們如想建設繁榮的中國，不但在農業上要努力，在別的實業上，也要有相當的努力。旭生先生似乎也想到這一點，所以他也「希望我們的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不再受帝國主義的壓榨」。可是他只希望而已，在他的教育方案中，實在看不出實現在此種希望的教育。他的國民學校中，先生學生盡屬農夫，一切的學校，都附設農場。從這種學校出身的學生，耕田種地，固然是拿手好戲，但是要他們從事于別種職業，試問有無此種能力？

所以我的意思，以為在市中的國民學校與師範學校，與其附設農場，不如附設工廠。與其教他們種地，不如教他們織布。與其教他們拿耙，不如教他們開火車。與其教他們割麥，不如教他們打電報。與其教他們研究土壤，不如教他們研究都市交通，與其使法官耕田，不如讓他利用那些時間，去研究中國的司法制度。與其使醫生種地，不如讓他利用那些時間，去設法減低中國人的死亡率。總之，中國社會中的生產事業，不只農

業一項；中國社會中所需要的人材，也不只農業人材。教育制度，要造成各色各樣的人材，要滿足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國民學校中的學生，旭生先生要他盡屬農夫，乃是我所不敢贊同的。

不但在都市中的學校，不必教授農業，就是農村中的學校，也不必專教農業。我是因爲看清楚中國農村中的人口過剩，所以有此種主張。農村中的人口過剩，何廉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六號中已有說明，我們徽州人，尤其深刻的感到這一點。在我們那兒，農場是很小的，一個農場的经营，有時交給家庭中的女子便夠了。這種小農場的生產，不能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同時農場的经营，也用不完一家人的勞力。於是這些過剩的勞工，只好向外發展，向農業以外的職業去發展。中國南部有一句土話，說是「無徽不成鎮」，這是表示徽州人在外路謀生者之多，但這種情形，實有經濟地理之背景的。中國有些地方的情形，一定與徽州相彷彿，如甯波，如廣東的許多部份都是。在這些鄉村地方，如只給他們以農業教育，一定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辦教育的，一定要斟酌當地情形

，除農業教育外，還要辦商業教育，工業教育，以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此外中國還有許多地方，有其特殊的源富，如山西之煤，河北之鐵，湖南之錫，雲南之錫，爲充分利用這些富源起見，那麼在這些省裏，豈可忽略鑛業教育嗎？

至如中國將來的情形，恐怕對於農業以外的教育，需要更有甚於今日。這是將來的話，現在也不必多談。

最後，我願意對於這篇文章的題目，加一解釋。「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二詞據旭生先生說，是採用梁漱溟先生的。他們都反對都市教育，而主張鄉村教育。假如目前的中國教育，是都市教育，那麼都市教育，誠然是可反對。但是與其稱目前中國的教育爲都市教育，不如稱他爲遊民教育。因爲現在的學校，特別是中學，只製造出來一批一批的遊民。他們當然不會耕田種地，在農村中做生產的事業。但都市的事業中，又豈有他們的地位？他們固然不能從事於農業，又豈能從事於工商業？所以把中國的教育叫做都市教育，真是冤枉了都市教育這個名詞。假如我們說都市教育是工商教育，以別於

鄉村中的農業教育，那麼都市教育在中國應當提倡，正如鄉村教育應當提倡一樣。在創造新中國的過程中，我們要發展農業，同時也要發展其他的實業。假如我們承認這一點，那麼旭生先生的教育方案，就應加以修正，使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在他的方案中，都佔有相當的地位。

右錄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

二月，二五，清華。

答

吳景超先生的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一文（獨立評論第四十期），同我很誠懇的商榷，舉了很多的統計，使我對於從前認識模糊的東西得到比較清楚的觀念，我非常感謝。在實行上，據我看我們兩個所主張，似乎不至於有大差異，或者竟至於完全無差異，亦未可知。可是，在理論上，我們兩個的立腳點，差別很大。乘機討論，也是一件很有興趣的事情。現在將我的意見略陳如下：

爲什麼在實行上我們兩個所主張，無大差異呢？主要的就是我這方案，太偏重農業

，對於工業沒有把牠應得的重要位置給牠，我自己也很覺得。我雖然也主張在國民學校中於兒童十二歲後，授之以與本地相宜之簡單工藝的知識，但這仍是爲農家提倡副業的設法，並不是爲都會工人子弟教育特立的制度。我當時那樣主張，是否將工人完全忽略忘掉？不是的。我根本有一種偏重農業的意見，理由頗長，論理原文中應該述及。但是當時我因爲急著整理來西安的行裝，寫的已筋疲力盡；並且，我覺得這樣的方案，離實行的時候，中間不曉得應該經過多少次的討論和修正。這樣鉅大的漏洞，萬不會沒有人指出來。然則這樣的指摘，寧可以說是我預先料到的。現在，這樣的漏洞，果然引出來吳先生的大文，並且使我得了不少的新知識，因懶惰而得了利益，私人之喜可知也。吳先生主張在市中的國民學校與師範學校附設工廠，我個人也是很贊成的。至於中國的農人多，不管牠是可希望的現象與否，但這是一種事實。吳先生以爲設法令他早日脫離才好，不管這種脫離應該與否，可能與否，在這脫離與未脫離的中間，一定需要頗長的時間。在這個時期當中，是「遷就他」也能，不是遷就他也罷；總應該給大多數的人民平

等受教育的機會，我想吳先生也不會不承認。至於吳先生所說，與其使法官醫生耕田，不如使他們利用這些時間，研究與他們職務有關的東西，那正是我的意思，我雖然堅決主張教員耕地，却不主張法官與醫生耕地。因為什麼呢？因為農忙是有一定時期的，受課推到農間的時候，毫無損害。可是人害病和犯罪是沒有一定時期內，也許農忙人易生病，醫生也要跟著忙，他們怎麼樣能夠耕地？但是我一定要專門學校，除工商業外，全習農業者，我已經說過：「亦以防學或中輟，失業堪虞也」。所以我覺得我同吳先生，雖然在理論上立腳點完全不同，而實行上或不致有很大的差異。

吳先生在理論上根據，是說「文化先進的國家，生活程度高的國家，沒有一國的農民，其百分數是在七十以上的」。凡是農業進步的國家，沒有一國農民的百分數不是下降的」。這些現象，我雖然知道的不詳細，可是也有點模糊的知道。但是這裏面就沒有問題了麼？近代的文化是一種工業的文化，是一件毫無疑義的事實。近代的經濟制度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制度，政治系統是一種帝國主義的系統，也是一件無從否認的事實。

工業文化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有極密切幾乎很難分離的關係，大約也是不容否認的。帝國主義者必須要有商場，要有殖民地，要有受他們壓榨的民族，大約也很難否認吧。這一種一方面壓榨，一方面受壓榨的現象，我希望不是永久的吧。蘇俄一方面使自己的農業工業化，一方面竭力發展自己的輕重工業以抵制帝國主義者的侵削，是一件很好的先例。如果世界各民族全跟著蘇俄這些點走，資本制度，帝國制度，大約要崩潰，恐怕吳先生也不能不承認吧。英國不必說；就是法國，如果使他完全離了他的殖民地，並設想其他的民族的工商業也有相當的發展，我雖然不敢說，他的文化完全無法繼續，然而大約也要變了形貌吧。農業進步，少數人耕種，就夠多數人的食用，是必然的現象；但是，工業進步，用很精巧的機器，用較少的工人，就可以夠全世界的享用，恐怕也是一定的現象吧。機器工業不會轉回去變成手工業，我想吳先生對於這一點，也不會有疑惑吧。農事工業化，固然可以利用不少的機器，但是農田散漫，所能利用的機器，比較有局限；至於工業，比較集中，其所能利用的機器，要比較多的多；恐怕也是很有理由的

吧。我理想中的社會，不像現在在在何地方所見的社會。那個時候，任何地方的交通，異常便利。工業不是聚集於幾個大城，却是散處於無限的小城的。工業城市頗受農村化，均有林園之勝。圖書館，實驗室，每城均比較完備，人人可以進去工作。工作每日五六小時即足，餘暇即入圖書館實驗室，探求新知識。至於農村則受工業化，比較現在聚居。一切享受與最高富裕的城市完全相等。每年忙四五個月，餘為暇時，可自由旅行或研究學問。忙時工作也許過八點鐘至十點鐘。農村裏面，也是圖書館，實驗室，娛樂場，應有盡有。這時候並沒有什麼商業，交通業，運輸業，金融業等等的特別職業。這些全與官吏一樣，為一種公務人員。社會大約只有三種的大別，農人，工人，公務人員。三種人的享受和權利，完全相仿，無大差異。我想到這個時候，叫人自己選擇職業，大家未見得多數舍去終天忙，半年閒的農業，去選擇半天閒，終年忙的工業或公務人員吧。衣食住行，固然全很重要，但是建築一所屋子，可用之數十年或數百年，造一件飛機輪船或火車，可用之數年或數十年，總不像吃了幾點鐘就餓，衣裳幾個月就破。問題固



然很複雜，並不如是簡單，但是由此也少微可以看出：到那時候，所需要的工人和公務人員的總數，未見得就超出於農人的總數吧。所以，工業文化，雖然在近世紀籠罩了全世界，可是說牠在將來還爲世界全體文化的總標幟，恐怕也很有問題吧。從前因工商業發達而農民減少，以後又因爲農民生活的增高改善，而農民又加多：也並非不可能的事情。不甯惟是，還有一點，我不敢斷定，我却有點模糊感覺，就是：中國的文化發展的比較遲，不像古代希臘人和近代歐美人的一日千里。但是牠却有綿延性。他同時的文化國家，一個一個的淪沒了，絕滅了，而牠却總在那裏或盛或衰的綿延著。就是現在，國難緊急，我個人對於現時的教育，也有很多的危言，但是我却不相信中國的文化不久就會斬絕。這種文化的綿延性是否與中國的農業社會有相當的關係，也是一件極有興趣的問題。凡治歷史的，不能有一件諉爲偶然的結果。如果吳先生或其他治歷史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先生們，能對於這個問題，細加研究，把牠解決了一部分或全體，那對於人類全體的貢，或不算很渺小呢！

最後要申說的：我沿用梁漱溟先生都市教育，鄉村教育兩名詞，是要表示實在怎麼樣的問題，並不是要表示應該怎麼樣的問題。我根本覺得現在我們所抄襲外國的制度，是工商業社會裏面的附產品，與農業社會不合。無論怎麼樣辦，也辦不好。即使承認中國應該盡全力發展工商業，而過渡時代，這樣的教育制度也萬不能用。言盡於此，還希望吳先生詳細的見教。

至於陳序經先生的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獨立評論第四十三期），我覺得同我的主張毫無關係。他說看見我那篇教育罪言的結論很失望，不曉得他失望什麼。我覺得我的主張，對不對自然很成問題，但是復古嫌疑，却似乎萬不會有的。我推論中國教育從孔子起就開始走到錯路上，而陳先生却疑惑我提倡數千年已有的農村化，豈不是咄咄怪事！並且我覺得陳先生的話頗浮淺，我疑惑他對於陶因及我的文字是否曾仔細看過，是否把意思看清楚。我個人並沒有用中國化這一個詞，並且也毫沒有復古的意思。至於

陶因同國聯教育考察團，是否用中國化的名詞，我不記得。即使他們用這一個名詞，我覺得他們的意思，也不過如翁咏霓先生某一次所提出的問題：中國的礦自有中國的特別情形，拿西洋的辦法照樣搬來。不見得能合用，必須就中國的礦詳細研究出來辦法，才能合用。在民國九年十年，我看見有二梁先生所領導的復古運動，至於近兩年，我却沒有看見。至於把攻擊抄襲辦法的全當作主張復古的人，我想那樣的定義恐怕未見得恰當吧！陳先生疑惑我主張復古，或者因為兩點：第一，我特別重農。那詳細看我的改革計劃和上面答吳先生的話就可以明白，不必再贅。第二，我沿用梁漱溟先生的都市教育，鄉村教育二名詞，而梁先生却是主張中國文化的。我覺得梁先生所主張的鄉村教育同他所主張的中國文化，兩件事情並沒有不能分離的關係。我個人現在對於他那中國文化的主張，尙未能表示贊否。我反對都市教育，完全由於民衆經濟的觀點，同梁先生的觀點，也稍有不同。所以我覺得陳先生反對中國化的議論，如果是對我而發，那却是無的放矢。